

平心著

人民文豪
鲁迅

叔倫
印

舊

人民文豪魯迅

著者 平 心

出版者

發行者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新中國書局

東北·華北
華東·中原

一九四九年二月東北版再版(哈爾濱)

發行五千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08.
8629
8577
28

目次

第一章 戰鬥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

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

第三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

一
二
三
四
五

國家圖書館



002385318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	七
第二節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爲什麼出發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	六
第三節	魯迅所擔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務……………	三
第四節	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	九
第五節	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	一〇
第六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	三

重刊獻辭

魯迅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不能單從文藝方面來估量；他的崇高的文藝成就，並沒有掩蔽他在思想啓蒙與學術著作上所放射的光輝。假如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常由若干先驅者的思想業績增大它的重量，魯迅無疑是變革中國民族精神的主要先驅者之一。

魯迅在思想業績方面表現的顯著特點，不但在於他經常用文藝形象來表達他的批判、教化與理想，尤其重要的是，他始終是離開了個人的利益與小圈子的好惡，爲人民大眾喊出了不滅的心聲。多難的中國民眾借了他的筆，蘸着他的淚水和憤火，宣洩了自己的悲苦與歡欣，詛咒與頌揚，控訴與希望。經過了辛亥、五四、大革命、土地改革運動四次歷史蛻變，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表現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洞見與進步。他的照耀現代中國精神生活的光彩，柔和而且有力，使人樂於親近而不易忘却；這不僅因爲他一身兼爲藝術思想家與思想藝術家，更其因爲他熟悉受苦大眾的愛憎和要求，而且不斷舉起他的藝術武器，爲人民的真理與正義作戰。

我們出生較晚的少壯騎士，絕少沾染士大夫的舊習，很幸運地自幼就接觸到世界思潮；我們可以自由挑選思想學術的新兵器，因此不易了解上代的老戰士在精神戰鬥歷程中的艱難。假如讓我們出生在魯迅時代，整個心身背負了古舊的社會積習與精神傳統；要趕上時代的潮頭，不光要跟舊社會苦戰，同時還得跟壓在自己靈魂上肉體上的厚重歷史沉澱物爭鬥；這豈但需要過人的勇氣，還少不了出來的識力；而這種勇氣與識力又必須富有持久性與韌性，越是經歷磨難，越能爆閃照人的火花。讓我們數一數跟魯迅同時代的人物吧，究竟有幾人具備了這些條件，自少壯到老死始終成爲大眾的發光體，從不吝惜他們的心光腦力，一切爲了人民，一切獻給人民的呢？根據這樣的結算，我們對於魯迅的崇拜和感激，就不是用文字言語所能表達的了。

這個巨人好像是專爲打掃人間污穢增添人間美觀而來到這世界。他不止是第一個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者，同時又是社會變革的預言者和新生力量的護持者；他的成就是超於文字語言之上的。

我願爲魯迅作見證：是他，用溫情與智慧哺育了無量青年，是他，除了咬痛青年靈魂的苦悶與寂寞。我自己就是會受他的潤澤的一個。直爽地說，我並不震驚於他身上顯耀出來的世俗的所謂淵博，中國近代在學術成就上足以和他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他的人，不是沒有，但像他一樣，以忘我的大無畏精神，充當人民代言人與革命大護法，開創一代文化新風氣的不朽作家，

在中國還不易找到。使我們忘記不了的，是他始終不以知識與文字爲獵具，爲玩物，而一直是利用它們作爲爭取人民解放的武器。他刻畫黑暗世態和描繪光明風景的筆觸是那樣犀利有力，深深地掘進了舊社會的腐爛靈魂，也照亮了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青年的心。無數戰士在他的畫筆下看出了舊中國死滅之前的絕望，也看出了新中國必然勝利的希望。用新生的希望抗擊老衰的絕望，這就是中國人民求生的道路。照耀這道路的魯迅，與其說是高懸夜空的孤星，不如說是燃燒在人民中間最大的不滅火炬。這枝火炬跟無數民間的燭火聯結起來，順着新民主的風向越燃越旺；而正是魯迅越戰越毅的強毅精神的不朽象徵。

魯迅由一個主張「人性解放」的自由主義者進步而爲要求「生存、溫飽、發展」的民主主義者，到了晚年，更進步而爲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的社會主義者，這是中國人民進步與社會轉變的明確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有眺望歷史遠景的勇氣和珍視人民利益的熱忱，他遲早會找到歷史最高的真理。聞一多說過：「從前我們在北平寫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我們寫錯了；魯迅對，我們錯了。」這話不但表現了一個人民戰士追求真理的謙虛美德，同時也指證了歷史的真理俱有雄偉無比的說服力量。由於先後接受了這說服力量，魯迅成了人民大眾的辯護士，聞一多成了民主運動的殉道者。

從魯迅、聞一多諸往哲身上，我們看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路向，也看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

解放與民族獨立最後成功的必然性。我們與其消極地說，他們的死是不可補償的錯誤損失，不如積極地說，他們的不死是民族光明的不竭泉源。（類似的話我在本書「初版自序」中已經專為魯迅說過，這裏願重複一遍，意思是要強調魯迅、聞一多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說他們不死，並不是一句過分恭維的世俗老調，而實在是有歷史的真實性的。因為他們是永遠屬於人民的作家；當作歷史的創造力量來看，人民纔會死滅過呢？

我從沒有親近過魯迅本人，只不過讀過他許多並不合於「正統」文士所謂「溫柔敦厚」的標準的著作。我好像感到他的跳動的心臟，至今還依稀檢得出留在他的書裏的淚痕。我從不無條件地崇拜一個人，對於魯迅也是一樣。但我承認，我是承受了他的一部分遺產的。我珍愛這份遺產，正像我珍愛世界許多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的遺產一樣；因為它除了給我以不滅的智慧而外，還給我以無窮的勇氣。當我蜷居孤島家燭待旦的長夜，由於四周空氣的窒息與住所典籍的便利，我讀了許多佛經與古書；使我不致凍結前進熱情陷於空虛消沉的，除了抗戰勝利的確信，歐美革命大師與民主先哲的文獻和中外革命史知識而外，就要算魯迅的遺著了。這其間，我斷續寫了有關魯迅的論文約十數萬字。結集在這裏的，是研究魯迅思想較有系統的專論。一九四一年曾由上海長風書店出版，書名是「論魯迅的思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全部書版遇毀，不復重刊。現在承蒙長風主人徐履堂先生慨允我將原書收回重印，感激與喜慰之情交融一片。書名改為「人民文

「魯迅」，是用來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我願以這書獻給不甘淪落追求光明的青年，跟我一同
呼吸人民英雄的氣息。

平心



第一章 戰鬪的現實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引言

一切偉人出現在時代的頂巔，適應歷史的需要，作為廣大羣衆的代表而戰鬪，而工作，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看來，完全是一種必然。但是，某一個特殊偉大人物，剛好在某一時代，某一民族出現，以其特有的精力，品格和行動影響歷史，在史頁上留下一抹異彩，却又是一種偶然。中國在封建宗法社會沒落過程中，在殖民地化過程中，在向新社會轉變的艱苦途程中，必然產生適應民族解放需要的革命智識份子，並且必然從舊社會的游離份子中徵發積極敢爲英畧正直的特出人物，充任民族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參謀；最近二十年來大批智識份子投奔革命前線，就是顯明的實證。然而，在這個歷史蛻變過程中，一個從舊社會和仕宦家庭出身的智識份子，由于特有的遺際和修養，靠着出衆的天才與努力，憑藉文藝工作和思想活動，在許多同代的文人學者倒退、落伍、升官、退隱的瀾潮中，始終高舉戰旗，作為中國人民的卓拔精神代表而苦鬥，而吶喊，在現

代的中國文藝界中找不到第二個人，這就不能不歸歎魯迅的特異和偉大了。魯迅不幸而出生在中國，使他的天才和工作不能發揮到可能達到的極境；但是，他又幸而生在中國，因為他目擊到和參加了中國特有的民族劇變的巨大場面。

關於魯迅，有著各式各樣的比擬。最通行的一種是把他比作高爾基。此外，還有人把他比做果戈理、蕭伯納、伏爾泰。

「中國的高爾基」，這是對魯迅一種極流行的尊稱。是的，中國只有一個魯迅，正像蘇聯只有一個高爾基一樣。雖然魯迅自己曾經很謙抑地說他還不能跟高爾基相比，但我們總不能否認在這兩個巨人之間有著許多相似之點。他們都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文化鬥士和勞苦大眾的親密朋友，他們都是平民的現實主義藝術巨匠，他們都是由舊社會奮鬥出來而成為舊社會的鐵硬反對者，他們都各自領導一個大國的革命文藝運動，他們都以盡力哺育從事革命文化工作的青年，他們都不是僅僅屬於一個國家而是屬於全世界的文豪。可是，不能在這兩個偉人中間畫一個等號。高爾基跨過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俄羅斯，穿越十月革命，筆直的走入勞動大眾主宰的社會主義世界。他很幸福地親自接觸到最多采，最多變的歷史風景，他的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能够積貯最豐富最現實的創作題材，前輩（如珂羅連珂、契科夫等）的文藝指導和舊俄的寫實主義藝術傳統使他在創作生涯中獲得了不少便利。因此，高爾基能够用大部分精力描繪他親歷的俄羅斯巨大

轉變的畫卷（他的自敘傳三部曲和巨著「薩姆金的一生」以及其他小說戲曲等都是俄國社會動亂的真實史畫），他的多產的創作生涯和他所處的特異的社會生活是聯結得不可分開的。但魯迅是生長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是一個背負着吃人的封建社會僵尸的苦難國度，是一個飽受着異族欺凌和帝國主義踐踏的愁慘國度，同時也是一個醞釀着叛亂、復仇和起義的革命國度。他不斷在頑石般的舊社會殘骸之下掙扎着，搏擊着，不但要擊退周遭吞噬人民大眾的黑暗勢力，而且要掙脫那網住他自身的古老傳統。他的教養環境和生活圈子使他長時期不能找到夥伴，而不能不寂寞地作孤軍的困鬥——直到晚年，他才尋覓到了步伐一致的戰鬥隊伍——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浮泛着濃厚的渴望光明的憂鬱色彩。正因為他是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中，中國民族的多難和戰鬪喊聲的稀微，使熱情的他不能支出很多時力從事長篇鉅製的創作，而祇有選擇最善于直接攻擊黑暗和打開民族血路的武器來衝鋒陷陣，這就是為什麼雜文成了他最主要最精鍊的寫作體裁的原故。中國急迫的民族革命和苦難的大眾生活在精神上需要魯迅式的白刃戰，正像俄國的壯烈戰鬥場面 and 漫長革命行列在精神上需要高爾基式的鏖戰一樣。（自然，魯迅也是主張鏖戰的，他勸青年「常抗戰而自衛」，就是此種戰術的說明；但魯迅的 *Kamikaze*（社會雜文）的確是最便於短兵相接的武器；高爾基有時也作白刃戰，他也寫過許多尖銳的社會論文，但他的龐大的藝術製作是大眾進行鏖戰最好的武器與食糧。）

魯迅和果戈理與蕭伯納，自然也有幾分相像的。果戈理和蕭伯納暴露上層社會的鄙陋和醜惡的筆鋒，在魯迅作品中也時常可以看到。魯迅的機智與諷刺在某種程度內受了這兩位文豪的影響，大約是不成問題的。但魯迅對於他們兩個人的觀感却不相同；對於果戈理，是欣動于他的刺露舊俄羅斯的寫實主義筆，而對於蕭伯納，是傾心於他的撕掉紳士假面敢為正義發言的潑刺精神。從思想上說來，果戈理雖然無情地描繪了愚鈍可笑昏慣無聊的舊俄羅斯的真實面影，雖然對被凌虐的下層民衆（農奴等）流露了醇厚的同情，但他不是堅定站在被壓迫大眾方面對黑暗勢力揮劍的，他沒有勇氣攻擊紳士地主資產階級的社會到底。他晚年焚燬自己的稿件，就是對於先前暴露舊俄的寫作表示懺悔的變態行爲。魯迅對於舊社會是到死不寬容的，他用「一口咬住了不放」的勇烈精神攻擊黑暗勢力，並且始終爲了被壓迫大眾吶喊，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在果戈理的生活與思想中是找不到的。至於蕭伯納，誠然是上層社會無情的暴露者，並且敢于抗議黑暗對光明的進攻，他的全部作品正像魯迅的作品一樣，是最使正人君子紳士淑女頭痛的；但蕭伯納應當認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正義感的作家，他的工作止於暴露與諷刺；而魯迅應當認爲是被壓迫民族的戰鬥思想家，他的工作愈到後來，愈深入於無產大眾的戰壘。自然，上面的比較不是從藝術的角度出發的。

把魯迅比做伏爾泰（有人譯作福祿特爾）的，乃是斯諾（「西行漫記」作者）。他以爲魯迅

高呼反抗，反對寬恕，是跟伏爾泰一樣的。魯迅的「阿Q正傳」和伏爾泰的「幹地德」(Candide)同樣是富於反封建反愚昧的啓蒙意義的力作。伏爾泰的作品曾經燃起了法國革命，魯迅的思想也是中國革命的引火物(大意如此)。但是，魯迅和伏爾泰其實有極大的差別。伏爾泰雖然反對殘餘的農奴制度和封建專制主義，憎惡貴族階級和階級特權，然而他所憧憬的，不過是開明的君主立憲政體，他根本就看不起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且他不能堅持自己一貫的孤獨立場。他早年以無神論者猛攻宗教，一到了晚年，便公然擁護宗教，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的精神枷鎖來套住沸騰的貧苦大眾的心。魯迅一開始就猛烈襲擊封建社會，他以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追求人民的徹底解放，他更同情和尊重被侮辱被損害的勞動大眾，後來竟然心於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他不但沒有絲毫動搖過他護衛真理與正義的反抗精神，而且愈到後來，愈加磨銳他的戰鬥鋒芒，他是不寬容黑暗勢力與愚昧濁流的矯健戰士。他的堅毅人格是和愈老愈衰的伏爾泰完全兩樣的。假如伏爾泰不過是卑怯的自私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則魯迅便是剛強的正直的勞動大眾的精神導師。這種差異不能簡單歸因於兩個人的氣質，而應當歸根於革命時代的不同。

把魯迅和外國的歷史偉人比較，必須首先打破沒出息的民族自卑心。很有人以為魯迅之被尊為國際文豪，是由于中國文壇太荒涼，不能不把魯迅捧出去與世界文豪並列。這不僅是對於魯迅的輕蔑，而且是對於中國民族的侮辱。在中國光輝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與世界偉人比肩的傑

出人物，決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不論從藝術、思想、戰績那一方面來說，魯迅在國際間都自有其不朽的地位。一切人種偏見者縱使任意顛倒歷史的是非，然而決不能長久割斷大眾的愛憎。中國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歷史偉人總有一天深入全世界革命大眾的心。歷史將證明魯迅是屬於世界的。事實上蘇聯人民和世界進步份子不是把魯迅的死當作世界的損失而表示深切的哀悼嗎？只有那些「完美的蒼蠅」纔不量力地想用自己污臭的薄翼來遮蔽偉大戰士的不滅豪光。

但是，研究魯迅，不能離開他所生存的民族環境。割斷魯迅思想和世界的聯繫，固然是淺薄而荒唐，一味按照一般的公式對魯迅思想作抽象的評價，也是浮泛而不實的。正像魯迅自己說過的，他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全部著作與事業不但是以中國民族的革命需要為根源，而且滲透着中國特殊的優秀傳統，呈現着中國特殊的民族風格。魯迅的思想是中國多采多樣的民族自覺運動與民族戰鬥生活的生動寫照，轉過來又推動中國的革命輪索。魯迅接受了中外最豐富最精粹的文化遺產，而又保留了中國民族的進步的特質。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世界思想家。

第二節 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的根源

中國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必然推動無數智識份子參加革命行列，魯迅之成為中國人民的崇高

導師，正是客觀的革命要求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和戰績是不能僅僅拿客觀的自然規律來說明的。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革命運動中的人物，爲什麼到了後來，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望風而降，有的潔身而退，有的食人而肥，獨有魯迅等二三戰士（如李守常等）始終擁着革命的大旗而作戰到死呢？爲什麼在千萬文化人中，唯有魯迅能够長期成爲中國人民的最有權威的思想導師呢？機械論者把他的全部業績一概歸因於客觀環境，是和唯心論者把他的一生成就完全歸因於天才一樣不正確的。誠然，魯迅是歷史的產兒，他的思想是現實的反映，然而不能否認，在他的不斷前進的過程中，他的主觀的能動的精神力量對他自己對於時代起了強有力的作用，雖然這種精神力量歸根說來，仍然不外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一切能够對現實世界作親切的忠實的觀察的人，他的思想總多少反映客觀的真理，因此在歐美資產階級上昇時期，我們能够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隊伍中找到不朽的思想家；同樣，從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出身於舊社會的人物中，也能够找到最進步的思想家。但自然，假如不是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要從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之中產生最健全的革命思想家是不可能的。魯迅的一生如果沒有接觸到世界革命的巨潮，他仍然可以成爲舊中國一個有智慧有正義的天才文人，但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思想戰士。正因爲他是處在中國革命運動突飛猛進的時期，他的思想浸透着中國和世界億萬羣衆所服膺所支持的革命真理，他纔能够成爲中國和世界革命大衆的燦爛明星。但是，時代的進步並不能減小魯迅

的偉大。假如他不能頑強擺脫那網住他的舊社會的因襲力量，不能持久反抗現實的黑暗勢力，不能深刻體察大眾的革命要求，他必然「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助的輪，和時代隔絕了」。

（「且介亭雜文末編：因章太炎而想起的二三事。」）他的天才也必然為舊社會服役。在中國人民爭自由，爭進步的光榮歷史上，將看不到魯迅這不朽的名字。魯迅之所以不朽，在於他不僅自己動手猛攻舊中國的黑暗牢獄，而且不斷號召人民大眾攻打這座牢獄；在於他不僅用筆觸用喉舌表達了中國民族的戰鬪，而且傳佈了最下層的大眾的革命戰叫；在於他不僅始終站在時代的第一線提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要求，而且直接參加在戰鬪中去努力實現這些要求。如果要問，什麼能使魯迅能夠肩負起大眾導師的任務的主觀力量呢？這就是他的不斷把握現實，深入現實和變革現實的求真精神和戰鬪要求，這就是他的始終一貫的戰鬪的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使魯迅不斷前進，使他的思想包含許多不自覺的辯證唯物論成分，最後使他走入無產階級革命的陣營。

由舊社會折磨所引起的痛苦可能使人由屈服而變成無恥奴才，可能使人因麻木而變成庸夫俗子，也可能使人由反抗而變成堅韌戰士。魯迅是屬於後一類的人物。他從小飽嘗了冷酷兇殘的舊社會的欺凌和迫害，但他絕不從個人的命運出發來找尋自己痛苦的根源。他從有社會意識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敏感到他周圍的人物以至整個的民族國家都生活在冰冷陰暗的深淵中，生活圈子愈擴大，他對人生對社會的觀察愈深刻，愈細密，他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和民族的大眾的苦難聯結

起來反覆思考分析，終於養成了他冷靜揣摩現實，熱烈撫愛大眾的優秀習慣。因為他自身就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一個，對於舊社會的荒淫殘酷與愚昧昏庸看得最熟悉，最透徹，所以他「毫不可惜牠的潰滅」。〔二心集〕序言。〕又正因為他覺察下層大眾的挨苦受罪和誠實可愛，使他對勞苦大眾表示深切的同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使他「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同上。〕因為他的對舊社會的憎惡和對下層大眾的熱愛不斷交織着，就鍊成了一種報復的反抗的和自我犧牲的堅毅性格。他的做學問，做事業，都從辨明是非，分別憎愛這個樞軸出發，所以很自然地會走到革命大眾所應走的道路。但是，他是一個最有自知之明的戰士，他深知舊社會的殘暴可怕，要靠一己的一時熱情衝動去反叛岩石般的舊社會，是一定吃虧而不得到戰果的，因此他極力把自己的熱情澀縮在冷靜的工作中。（歐陽凡海在「文學」中已經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大意說，魯迅的熱烈的情感是隱藏在冷靜的觀察中，這是很對的。）他懂得「常抗戰而自衛」的戰術。（「兩地書。」）深刻體驗現實，沉着迎戰敵人，虛心改造自己，誠篤接待大眾，這些就培植着他的戰鬥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主觀的現實主義精神一經接觸到工農大眾革命的動景，就使他堅定地献身于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自然，魯迅的現實主義是不斷在向前發展的；他的戰鬥人生觀愈到後來，愈加積極，愈加銳利，就因為他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在不斷高揚，不斷深化。

魯迅的現實主義最觸目的表現在他的文學與藝術製作中。誰也不能否認，魯迅是中國第一個

開創現實主義文藝的巨匠，他的創造典型的才能和刻畫世態的筆觸，使他的創作洋溢着從死文學解放出來的奔騰沸湧的活力。恩格斯說：「現實主義並不是僅僅重視細瑣事物的確切描寫，而主要的是在於正確地在典型環境中描寫典型人物。」魯迅正是「在典型環境中描寫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的天才作家。當別人還在破壞舊文學傳統嘗試新文藝創作的時候，他已經開始了現實主義的文學建設，「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作品就這樣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初基。他的投槍似的文筆一開始就使舊社會各色各樣的鬼魅驚心膽戰，因為他擊中了腐爛的舊社會的瘡疤和要害。他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遺產在中國以至在世界將是永遠不朽的，永遠光芒萬丈的。

但魯迅的現實主義決不僅僅表現在文學和藝術製作上。在這個巨人的全部生涯中，都熾燃着熊熊的現實主義火光。文學和藝術製作只不過是他的現實主義表現的一種形式。他曾自白了他寫小說的動機與任務：

「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他對於「病態社會」觀察得最透徹，他不能沉默。他要「療救」病態的社會，在他早年的生

活環境中，唯有揮動他那被靈動而犀利的筆。假如他不是自始注視和觸摩複雜的殘酷的現實，他或許沒有任何寫作，即有文章，也不過是平庸乾枯的東西而已。因此，並不是因為他先有文藝生活，然後才有現實主義的精神，而是先有現實主義的精神，然後纔有鋒稜驚人的文藝成就。假如把魯迅的文藝比作療救疾病的溫泉，那麼，他的博大淵深的現實主義精神就是熔融岩石的地熱（Erdbebenwärme Heat）。岩石般的現實世界在他的現實主義熱力灼燒之下，都融解成爲岩漿，他那滲入現實的地殼罅痕的情感、思考、想像和理解，就沸騰成爲溫泉。文藝是魯迅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種，正如溫泉只是地熱的表現形式之一種一樣。

魯迅現實主義的批判性和戰鬥性一開始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獄門相碰擊，就爆出了奇麗的革命火花。正如啓蒙時代的歐洲市民革命運動，是從爭取人性解放和人權保障開始一樣，魯迅的初期的寫作活動也是從「人」的發見和「人」的保衛出發的。在論及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時，他曾指出初期革命文學的特徵說：「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爲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門的壓迫和陷害。」（「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魯迅就是最早提倡人性解放的文學革命者。

抽象的人性解放論本來是一切啓蒙時代的文藝思想所依附的社會觀。在中國，這種要求人性解放的文學運動，反映着反封建和反帝的民族解放戰鬥的勃興。在封建黑暗勢力和外來侵略勢力

的籠罩之下，人民蠕動在死水般的愚昧精神生活中，他們背負着「舊的成法」，不能自由思想，自由活動。生活上是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的牛馬，精神上是少數寄生蟲和異族侵略者的奴隸。當無產階級還未自覺地躍上革命戰場的時候，農民祇是顛撲在絕望的叛亂與慘酷的失敗中，不能有大作爲；先天不足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堅決領導反封建、反帝的革命運動，在文化思想上反而時常傾向于對舊勢力的妥協。在這時候，就只有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起來用科學思想對抗封建守舊勢力的愚民統治。他們要在思想上動搖那古舊傳統的萬里長城，不能不開展一個反守舊主義的理性運動。這表現在魯迅的文字中，就是堅決反對「說罷廢埃，愧恍古國」（「墳」；「摩羅詩力說」）的幻夢，要求建立「舉一切僞飾陋習，悉與濼蕩」的「人國」。（「墳」；文化偏至論。）誠然，魯迅在當時祇是孤軍獨唱，他的對舊社會的攻擊也不過「如一箭之入於大海」（「華蓋集續編」），沒有什麼回響，但從他的論文中，不難看到他的早年思想是流動着人本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血液。

第三節 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主要內容

流產的資產階級的維新與革命，沒有搖動頑強的封建奴役制度，更沒有搖動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的死水中，很少有起來「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關將」

（「墳：論睜了眼看」），流行着的卑劣習慣，却是「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同上），對於麻木的一羣，是一切「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同上。）這種漂浮着愚昧和怯弱的「瞞和騙的大澤」阻絕中國民族進步的大路。爲着要打破那包圍人民大眾的陰冷和黑暗，爲着要衝破逃避現實和隱瞞現實的傳統惡習，魯迅高舉了現實主義的火炬，他大聲叫出來了：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

正視現實的戰士，是跟一切「逃避現實」，「屠殺現在」，「超時代」的反動勢力勢不並立的。凡是厭惡現世的人們，「都是現世的仇讐，他們一日存在，現世即一日不能得救。」（「華蓋集：雜感」。）實際上，那些厭惡現世的人雖能妨礙社會的進步，然而決不能阻住歷史的車頭。他們的空想祇是證明了自身不能免於沒落的命運。魯迅斥責了那些「屠殺現在」的復古妖孽，同樣也攻擊了那種超時代的反動空想。

「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一樣地欺人的。」（「三閑集：文藝與革命。」）

在論及「第三種人」時，魯迅同樣斥責了他們的超現實、超政治的空談，他說：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亂的時代而要離開戰亂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屠殺現在」的僵屍，大抵是屬於封建剝削集團和守舊的資產階級，而自命「超然於政治之外」的「第三種人」，大抵是屬於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但他們阻滯變革現實的革命運動是一樣的。他們都不願和不能正視現實，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掩飾黑暗的現實；不過「現在的屠殺者」是以復古主義為逃路，而「第三種人」則是以自由主義為逃路罷了。

許多逃避現實的人鄙視現在，他們把自己的「美妙理想」寄托於遙遠的將來，但是他們不知道：「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且介亭雜文。」）把將來和現在切離開來，那明明是企圖轉移大眾注視現實的目光，和迷戀骸骨的復古份子同樣有害於社會進步的。魯迅斬釘截鐵地昭告青年說：

「仰慕古代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墓蓋

集。」

又說：

「但爲現在抗爭，却也正是爲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且介亭雜文：序。」）

然而魯迅並非只執着於現在而忽視將來的，他堅決地相信，未來的中國與世界是必定優勝於現在。雖然他最初僅能從進化論着眼，對於「新的社會的起來」，只是熱烈的「希望着」，而「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但他對於未來並不絕望，他總不斷懷懷着那未來的新社會的遠景。因此，他痛恨那「屠殺了現在」也「屠殺將來」的僵屍，以慈母似的心懷高呼「救救孩子」，以導師般的熱誠指引和勉勵青年。少數青年的墮落與欺騙並沒有動搖他對青年一代的熱愛與希望。當他自覺地用階級論代替了他過去的進化論時，他把自己對於未來光明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新興無產者身上。他所理想的新社會，已經不是抽象的「好的社會」，而是真正能够使人「生存」，使人「溫暖」，使人「發展」的無階級社會了。

在現實世界，分明對立着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敢於正視現實的人應當清醒認識，歷史是決不會讓光明勢力永遠消滅，任黑暗勢力永遠存在的，就因爲要求「生存」、「溫暖」和「發展」的人類永遠存在，這存在便是未來光明的火種。魯迅的明確的歷史現實主義使他在大革命風潮中

對民族與社會的前途表示了樂觀的豫見：

「我們所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屬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特例。黑暗只能附屬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在另一處，他論到北京大學，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同上書：「我觀北大。」）

他一面深信「黑暗只能附屬於漸就滅亡的事物」，另一面堅信「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這裏閃耀了他的不自覺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光芒。斯大林在他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說過：「對於辯證法最重要的，不是目前似乎堅固的而已開始衰亡的事物，而是正在產生與發展的事物，即使這事物目前看來，還是不堅固的；因為對於辯證法，祇有正在產生着與發生着的事物纔是不可征服的事物。」那些「目前似乎堅固的而已開始衰亡的

事物」(斯大林語)，或者「漸就滅亡的事物」(魯迅語)，不管牠們外表上是如何富麗堂皇，不管牠們對於新生的事物是如何阻礙壓制，但人們在歷史的光照之下，總不難看出牠們決沒有光明的前途，牠們也決不能「因為黑暗而長存」。(魯迅語。)牠們為黑暗所附麗，可是終於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爲什麼？就因為牠們成了歷史發展的障礙物。當此等黑暗的宿主(Host)一經消滅，黑暗也就完結了。在另一方面，那些「正在產生着與發展着的事物」(斯大林語)，或者「活的而且生長」(魯迅語)的事物，儘管在目前看來，還是不堅固的，幼稚的，然而在歷史的光照之下，人們總不難看出牠們「有着希望的前途」，看出牠們是「不可征服的」，爲什麼？就因為牠們是順應着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生，而成長。牠們「不做黑暗的附着物」，所以「一定有着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向上的事物與向下的事物這樣在歷史上衝突，在現象上就表現爲光明與黑暗的鬭爭。舊中國目前似乎還相當頑強，然而在新中國的生長過程中，它終於要失去「存在的理由」(Reason d'être)，擁抱着它的濃厚黑暗，到頭總要讓位於光明。舊世界與新世界的將來也必然是這樣。魯迅這樣篤信着「活的正在生長」的力量，鄙棄「漸就滅亡的事物」，所以他對於正在新生的東西總是要護不遺餘力，而對於朽腐的東西則攻擊不留餘地。當「暴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說着「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的時候，魯迅斥責了他們的狂妄，他說：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嫩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是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着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墳」：未有天才之前。）

他對於文藝的態度是如此，對於其他一切問題的看法也是這樣。他的愛護「幼稚」與「嫩苗」的精神使他成為青年和孩子的良師和媒媾，他的痛恨「老衰和腐敗」的思想使他成為舊社會的叛徒和死敵。

雖然魯迅深信「黑暗及其附着物」遲早要歸於滅亡，但他又明瞭黑暗勢力是決不會自動讓位於光明勢力的，因此暴露黑暗世界的真面目，讓大眾清醒認識敵人營壘的醜惡、虛偽、卑污與脆弱，不但足以增長大眾反抗社會的覺醒和勇氣，而且可以指示大眾變革現實的出路與方法。魯迅的尖銳暴露現實的藝術，正是他的戰鬥的現實主義能夠吸引羣衆震駭敵人最有力的因素。他曾自白了他從事文藝運動的旨趣：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

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爲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他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集外集拾遺」），所以對於「黑暗主力」所支配的舊社會要無情地暴露，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華蓋集續編」），要撕下「紳士的假面具」（同上書），至少要在他們的「莊嚴的高尚的假面具上撥他一撥。」（同上書。）

爲了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南腔北調集」），魯迅借助了現實主義的文藝武器，他在早年的小說中，描寫了蠕動在灰色塵霧中的城狐社鼠，牛鬼蛇神。但是他不久就感覺到，用小說不易對於周遭的黑暗勢力立刻予以反響或抗爭，他於是採取了最迅速反應現實和最直接突擊敵人的藝術手段：

「況且現在是多麼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鉅製，爲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爲現在抗爭，却也正是爲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且介亭雜文：序言。」）

這是魯迅關於雜文的性質和任務的最好說明，也是他自己要寫雜文的理由的最好詮釋。

在魯迅的雜文中，充滿着最使「正人君子」、「紳士淑女」頭痛的芒刺。他的「論時事不留面子，貶諷非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的突擊式的短評，揭穿腐敗社會內部的荒淫無恥，險詐萬端，卑污可笑與庸俗無聊，挖出埋藏在現實泥潭中的各種矛盾之本質，教給大眾以戰鬥的經驗與韜略。不用說，在牠們當中，閃爍着魯迅的諷刺天才。他的諷刺，恰如世界一切最高超的諷刺一樣，本質上不外是客觀醜惡現實的暴露。正像他自己所說的：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且介亭雜文二集。」）

魯迅的諷刺，便是這樣的寫實。因爲他的筆鋒直刺入一切罪惡的心窩，就顯出了使惡敵寒膽，使讖友快意的驚人力量。淺見者流和卑陋論客看見他的筆下寫出了許多私人的名字，於是因爲他在發洩私憤，歡喜毀罵，說他在「專一攻擊一種對象」（葉公超作：「魯迅」）。他們以爲魯迅是只記得私人恩怨「睚眦必報」的罵人專家。可是，每一個有良心的讀者不難拿魯迅的全部著作來證明，如果這個巨人是「專一攻擊一種對象」，那麼，這個對象不是別的，正是爲惡蟲們所擁抱的腐爛發臭的社會，是專門凌虐大眾倒曳歷史的荒淫無恥的一群：

「樞紐是在這裏，他所諷刺的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槍存在，你的諷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偽自由書：從諷刺到幽默。）」那些插科打諢的無恥論客，攻擊魯迅個人，可是，他們常常忘記了自己是寄生在充滿着諷刺材料的腐爛的社會裏。

諷刺和辱罵決不能混為一談。用莊嚴的弓弦射出的諷刺之箭可以擊中敵人的要害，而用油滑的口吻叫出的辱罵之聲不能淹沒敵人的狂吠。魯迅就是反對用辱罵和恐嚇來進攻敵人的。他以爲「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南腔北調集』），對於敵人「笑罵雖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觀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同上書。）魯迅正是「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的諷刺能手，他的引人發笑的神妙筆致離開了嚴肅的戰鬥是不能解說的。他曾經說過：「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故事新編：序言。』）這種反對油腔滑調討厭插科打諢的謹嚴風格，不但始終浸潤於他的文字生涯中，也一貫表現在他的人生態度中。這裏順便引一段他青年時代留學東京回憶的斷片：

「我第一次所經歷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演講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也一定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便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也不外乎嬉皮笑

論。「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后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演講固然不妨夾着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三事」。）

正因為魯迅是最真誠最嚴肅的現實主義者，他的「投槍的一擲」纔能「使敵人受傷或致死」，他的銳利的暴露纔能使鬼魅妖魔無所遁形。

從魯迅的作品中，人們會感覺到，他對黑暗的暴露多於對光明的歌頌，特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此。他的對於舊社會的憤懣與憎惡，對於民族病態的無情暴露，使他的筆鋒有時透露着濃烈的憂鬱氣氛，甚至有時泛濫着淡淡的哀愁。庸俗的論客用白粉將他化粧成爲虛無主義者，悲觀主義者，以至什麼「內傾的個人主義者」。在他們評論起來，魯迅至多不過是一個憤世嫉俗的狂放文士，於是一代思想革命家被描繪成爲灰色動物的搖籃牌。但是，魯迅自己數百萬字的遺言就是對於這種醜態和曲解最有力的反駁。不但他的晚年著作充分證明他是一個積極捍衛光明的戰鬥者，而且他的早年著作也足以證明他是懷着光明渴望的前驅者。

魯迅是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攻擊舊社會的，是不惜以最無情的筆鋒來暴露民族病態的。可是，有誰能證明他對於中國的前途是抱着悲觀絕望的態度？有誰能證明他認爲國民性是不可改變的？他不斷目擊着和咒咀着腐敗、破爛、冷酷、兇殘的舊中國在壓迫和蹂躪進步力量，然而就在

他痛心於黑暗勢力猖狂橫行的時候，他早已響亮地喊出來了：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爲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在那裏發榮滋長。我們如果問問良心，覺得一樣滋長，便什麼都不必憂愁。」（「熱風：不滿。」）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熱風：生命的路。」）

上面是他早年對於民族，對於人類的樂觀展望。到了晚年，他的積極的戰鬥的人生觀更加和革命的歷史觀明確結合起來，一掃壓迫羣衆的悲觀氣氛與失敗情緒。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准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

「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一九三二年給韋素園信。）

「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

（「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他的永遠向前看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堅定了他對於民族與人類的光明前途的確信，對於新社會必然到來的確信。他始終在用着充滿自信的目光搜索前進，即使在他的泛濫着憂鬱與哀愁的作品中，也不斷表露着對於「新世紀的曙光」（「熱風」）的嚮往。（例如「野草」中的「希望」是他對於青年的消沉與頹廢的感歎詩，這首散文詩浮現着悲涼憂鬱的痕影，然而也閃爍着熱望新生的豪情。同書中的「過客」、「死火」、「淡淡的花痕中」等篇也是如此。）在這樣灼熱的愛世精神之下，那裏容得了虛無主義或悲觀主義，更那裏容得了什麼「內傾的個人主義」？

歷史證明只有那些「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或者坐在沒落的營壘裏」的灰色一羣，纔看不到歷史的光明前程，纔會扮演沒落的悲劇中的丑角。此種不辨是非與自甘沒落的頹風固然不能阻住歷史的前進，然而它吹掃正在彷徨中的群眾，確能散佈若干毒害，模糊人們對於革命真理的認識，搖動大眾打擊革命敵人的雄心。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向大眾指點現實世界的是是非非，就是要堅決打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混沌主義。當一些「文壇英雄」在那裏混淆是非，罵倒一切的時候，魯迅發出了堅強的抗語：

「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評，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却並不都是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雜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

有了分明的是非，纔會有熱烈的愛憎，「遇見所是和所愛的，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就反撥。」（「且介亭雜文：再論文人相輕。」）這正是一切頭腦清醒者處世接物與知人論事的正確態度。爲正義而戰的猛士，和自命爲公正的和事老是截然不同的，他「只是唱着所是，頌着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懷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eus）一樣，因爲要折斷他的筋骨。」（同上文。）至於超然於是非之外的「和事老」與「公正君子」，分明是在淆亂是非，是其非，而非其是。因爲人「不是上帝，那裏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正的批評。人自以爲「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辭意了。」（「華蓋集：並非閒話。」）是的，除了病狂而外，唯有醉漢是超然於是非之外的，然而可惜他的理性已做了酒精的俘虜了。

像黑白一般分明的是非之辨，使魯迅成爲堅持真理的剛強戰鬥者，像水火一般對立的愛憎之分，使魯迅成爲獻身正義的英勇先驅者。他一經辨明了是非，分別了憎愛，就咬緊牙根，爲他所是所愛的戰鬥不息，向他所非所憎的反抗到底。離開了戰鬥，是不足以說明魯迅的現實主義的。

從青年時代起，魯迅就歌頌破壞，號召戰鬥。他讚美「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偉大詩人，他提倡「主張破壞，無稍假借」的革新精神。他覓求「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

「作溫暖之音，授吾人出於荒寒」的「精神界之戰士」然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以上引文，見「墳：摩羅詩力說。」）他於是在寂寞蕭條之中「沉思」復「沉思」。待到他重新以「精神界之戰士」的雄姿闖上戰場時，世界革命的暖流已開始融解中國中古主義的厚重冰層了。從那以後，他的戰鬥要求透過文化革命運動，「便一發而不可收。」（「吶喊」序。）

中國民衆反抗專制的炸藥，在腐敗的滿清王朝的恐怖高壓之下，也層層炸幾次。最末的一次是辛亥革命。然而頑強的封建守舊勢力與市民階級的妥協傾向膠結起來，真也像黃梅天的濃重潮氣，使埋藏在革命民衆間的炸藥暫時潮濕起來了。「屠殺現在的僵屍」在「熱心復古」，「崇奉國粹」的濁潮中，拚命禁錮民衆的耳目，淤塞革新的洪流。「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墳：燈下漫筆。」）因此喚醒人民的戰鬥精神，轟毀腐敗的吃人制度，就成爲五四運動的中心任務。魯迅的戰鬥現實主義，正在此時，重新透過文學，烙印大眾的心。他舉起了「投槍」，猛擲那些隱藏在共和招牌背後的僵屍，他號召大眾衝破一切阻住革新道路的障礙物筆直前進：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襲擊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活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熱風：生命的路。」）

甘爲奴隸的士大夫們斥責一切反抗是「空費氣力」的妄動，他們的哲學是「不爲我首」，「不爲禍始」，甚至於「不爲福先」。（「華蓋集：這係與那個」），是要大家「雖死也如山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喩。」）魯迅就要打破那用山羊蹄跡踏踏的「天下太平」。任何頑強的反抗精神，任何英勇的戰士氣概，在他都視若瀟灑；即使不能有勝利的闖將，也應該有「失敗的英雄」；即使不能有速決的勝仗，也應該有「韌性的反抗」；即使不能有旌旗蔽空的雄軍，也應該有「單身嬰敵的武人」，即使不能多有敢殺身成仁的志士，也應該不乏「敢撫哭叛徒的刺客」。（以上加有黑點的引句，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因爲絕望的抗爭總勝於早怯的苟活，戰敗的悲歌總勝於待死的哀哭。

在五卅時代，轉戰於寂寞中的魯迅還不能從社會底層中找到他的戰友，唯有在青年中高唱他的戰歌。他鼓舞青年「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熱風：生命的路」），勉勵青年「無須顧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墳：燈下漫筆。」）當歐化的士大夫們在那裏高呼「多研究國題，少談主義」的時候，魯迅頌讚了那爲主義犧牲的殉道者：

「他們因爲所借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潰滅了烟燄。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熱風：聖武。」）

然而「新世紀的曙光」只能用集體的革命戰鬥才能爭得的。當魯迅從社會底層尋覓到了清

蕩蕩的戰鬥隊伍，也就是尋覓到了「新的戰友」（「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之後，他從那偉大的「黑土」裏看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建設，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也看見了中國新社會的明朗遠景。他更清醒地認明了惟有依靠大眾的革命戰鬥，才能迎取光輝的未來。他毫無憐憫地猛攻一切虛偽的「公正」、「中立」與「超然」，剝除反對被壓迫者戰鬥的和平主義的偽裝。他堅定地指出，任何事情不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不能「離開戰鬥而獨立」。一切有正義感的「馬前卒」，「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因為「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且介亭雜文：七論文人相輕。」）

然而，單知道戰鬥還是不夠的，因為「舊社會的根底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更大的力」就是「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的戰鬥」（同上），就是永不妥協永不寬恕敵人的韌性戰鬥。魯迅從血的教訓中牢記着反革命勢力是從來不妥協的。辛亥革命換來了一個「咸與維新」的局面，然而只因爲「先烈的苦心，對於鬼賊的慈悲」，使反革命的惡蟲到處「繁殖起來」。結局是怎樣呢？「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多」，「此後的明白青年，爲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魯迅的眼光是不够銳利的，他在大革命前夜，不但已經數說了革命對反革命讓步所蒙受的損失，而且預見了革命黨人的機會主義將引到怎樣慘酷的失敗。他明白道破了政治鬭爭和社會革命的普遍真理，指點了革命羣衆避免重大損失的正確道路。他主張用「打落水狗」的徹底戰鬥精神根本消滅進步勢力的敵人，鄙棄寬恕和妥協。他深知對敵人寬恕，就是對戰友犯罪，因此以爲寬恕是「怯漢所發明」的「美德」。（「墳」：雜憶。）在潮死時，還斬釘截鐵地申言對怨敵「一個也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末編」：死。）他對於舊社會惡勢力的洞若觀火的考察堅定了他反對縱惡的決心：

「……「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却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却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論費厄澁賴應該緩行。」）

正因為「善」的方面，「老實人」太多，一味「縱惡」，「寬恕」，「姑息」，「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結果老是「新的敵不過舊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老是革新勢力吃虧上當。難道過去血跡斑斑的史頁還不够證明魯迅的警告是值得一切戰士牢記的嗎？從太平天國一直到大革命，每一回革命隊伍的慘敗，除了客觀的原因

外，在主觀上總不能否認，革命對反革命的寬容，戰的戰鬥精神的缺乏，造成了連續不斷的血債。

魯迅的現實主義是富於戰鬥性的，同時他的戰鬥思想也是富於現實性的。所謂現實的戰鬥思想，就是清醒地認識戰鬥的客觀條件，正確地估量革命的主觀實力，根據此種認識與估量，跟黑暗勢力堅忍地穩紮穩打地長期作戰，這裏當然容不了各式各樣的浪漫帶克的烏托邦空想，也容不了一切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真正的革命戰士時刻都在為奔赴遠大的革命目的而奮戰，他們永不離開理想的火花。然而得時刻警戒各種美妙空想的誘惑，得像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烏斯（Anteus）一樣，「永遠站在地上，靠在有和撫養他的母親身上，以便取得源源不絕的新力量」（斯大林），他們得經常「與人民維持聯繫」（斯大林），腳踏實地的向前看，向前進。這們必須不斷地接觸實際的社會戰鬥。一切烏托邦的門不能為他們而開，反之，一切現實主義的路須由他們來開。倘或不然，即使口頭上高歌得如何慷慨激昂，文筆下描畫得如何光輝燦爛，也只能吹起許多帶有虹色的肥皂泡，「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二心集。」）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在革命進軍時和革命勝利後，往往容易熱狂興奮，但也容易動搖幻滅，頹廢叛變，就因為在他們的頭腦裏，預先按照自己的美麗空想打好了革命的烏托邦圖樣。當實際的情形一和這張華美的圖樣衝突起來，他們便唉聲嘆氣，昏天黑地，跌倒在革命的輪盤下面。這

就是魯迅所說的：「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二心集。」）爲什麼「左翼」容易變成右翼呢？那是因爲不明白：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的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愉快的，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詩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革命是清除積穢的麻煩事業，要把幾千年堆積在中國地面上的垃圾肅清，開闢美麗的田園和康莊的大道，那不但需要集合無數人力，而且需要切實工作者在污穢腐爛的塵垢糞土之上，在雜亂刺目的瓦礫荆棘之中，任勞任怨地工作。他們自然不是苦行修練的高僧，他們是血肉做成的戰士，當然要求快樂和自由；然而他們並不預先虛懸一個快樂和自由的極境，而是以大衆的快樂自由爲自己的快樂自由，是以大衆的榮譽休戚爲自己的榮譽休戚，是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工作融化在大衆的生活、思想和戰鬥之中。馳驅在大地上的清醒戰士決不至於浪費他的氣力，爲夢裏的樂園而舞蹈，又爲樂園的失滅而哭泣。他們的樂園是用赤血和苦汗從叢莽中開拓出來的，是以跟泥土搏鬥的艱苦工作耕鑿出來的。如果在長期的大規模的墾荒掘土的工作中，碰到了惡風淫雨，

飛沙走石，毒蛇猛獸，那決不是什麼意外的遭遇；倘若沒有這些遭遇，那纔是天國的奇蹟，人間的怪事。正因為革命的人間不是神祇的天國，所以革命的兵隊也決不是神前的天使，因此：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晒。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虛審革命的甜漿。」（「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參加革命隊伍的人不是來自一個階級，受過同一教養，當然不免有着各樣的意識和氣質在革命戰鬥中混流着，衝突着。也正因如此，所以在「行進時，時時有人退伍，也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加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這裏不妨用一個比喻來說明。經過城市邊沿流動的河水，總不免夾雜着許多市塵的塵垢污穢，然而只要河身不被堵塞，這些雜亂的渣滓決無礙於河水的奔流，愈向前奔流，也就愈加澄清，愈加活潑。革命隊伍的進軍何嘗不是如此。倘使不用神國天使的尺度來測量革命戰士的長短，就應該從大處着眼，認識革命乃是長期的對敵作戰，同時也是革命隊伍不斷的自我鬭爭。因爲「改革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華蓋集」），「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成了凝固的東西了。」（「而已集」）。革命隊伍誠然在進軍時會夾雜着許多無用的塵污渣滓，但是清醒的戰士總不能因爲腹有蟬蟲而長期絕

食，他們必須是始終沉酣於在戰鬪的大歡喜中，「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優事的。」（「南腔北調集。」）「正因為如此，那些『非革命的急進論者』要求『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二心集」：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

魯迅不但用清醒的現實主義來爭取革命，他對於一切事物與問題的看法，也是從現實的歷史發展過程着眼，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到處閃動着辯證法的火花。例如，對於語文，他就是處處從「歷史的現實主義」（借用王任叔的用語）出發。他認為「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語言，所以贊成 Esperanto」，但他又說：

「至於將來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却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只有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 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學獨木小舟，倘使因為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通信：「渡河與引路。」）

對於中國文字他也是如此看法：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

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葦蕪集續編』：古書與白話。）

他並不把世界語和白話文看作「萬古不磨」的極境，他以爲它們都不過是語文發展過程中必經的階段，正像渡河的「獨木小舟」和「橋梁」。自然，他發表這些意見的時候，還是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然而忠實於客觀真理的進化論，和唯物辯證法不是有着最親近的血緣嗎？只有庸俗的進化論纔無視事物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起的運動與發展。魯迅早期的進化論思想正孕育着革命的辯證法的個別因素，這就是他能夠跨過啓蒙主義和進化論而走向社會主義和階級論的內在動因。

在看待一切問題的時候，雖然永遠注視遠大的目的，但不虛懸一步達到的極境，而祇是緊緊抓住問題的實質，留心實現目的的步驟，這就是魯迅的一貫的現實主義作風。因此，他對於人物和事情決不按照一個固定不變的圖樣一味苛求，同時也不放鬆對於遠大理想的追求。他憎惡沒有骨氣出賣靈魂的政治「奸商」和「革命小販」，然而不奢望一切戰士都立刻變成完善無瑕的聖賢；他提倡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但並不苛求每一個作家都硬寫革命文學；他主張提高文化的水準，但同時注重通俗文化的普及；他渴望有完美的翻譯，但同時認爲應當用「吃爛蘋果」的精神接受翻譯；……（參看王任叔著：「戰鬥與學習」）。所有這些，都足以證明他是和公式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反對的，在他的思想中流注着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血液。

因為對一切問題和事情抱定認真不苟，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反對一切「只圖說得暢快」的「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同時也反對不務實際專重標榜的空頭主義，這就鍊成了他的嚴肅工作的特性。他不但善於打擊敵人，而且勇於解剖自己。（他曾經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而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他的虛心崇實的精神，使他甘為真理面前的「孺子牛」和革命戰線的「馬前卒」。因此在和創造社論戰的時期，他情願「等待有一個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他。（「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在論到介紹科學的文藝理論的時候，他很直白地說：「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的時候，我就忍痛。」（「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種用普羅米修斯的火來「煮自己的肉」（同上）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從他的熱愛真理，嚴肅工作的卓越持操蒸發出來的。他從來不以導師自命，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誰比魯迅更有資格在默默地充任青年的博大堅忍的導師呢？有誰像他那樣熱誠地給廣大青年施行嚴肅工作的洗禮呢？當一些自命為青年導師的「名流學者」在那裏向青年招搖撞騙的時候，他勸導青年用「自力更生」的精神作事做人：

「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開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

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荆棘塞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烟瘴氣的烏導師！

（「熱風。」）

當自暴自棄者流在那裏對青年散佈冷氣，阻絕青年進路的時候，他噴出了溫暖青年的胸氣：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像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熱風：隨感錄四十一。」）

集合無數黑暗裏的火花，不就賽過難得的炬火麼？「石在，火種是不滅的」（「且介亭雜文」），魯迅是第一個抱着此種自信站在青年當中擊石生火的巨人。

恩格斯在論及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學時，曾經極深刻地說過如下的話：

「只要真切地描寫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發生動搖，使人們對於現在秩序的永遠支配權發生懷疑，那麼，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就充分盡了它的使命了。」（Engels致 Minna Kautsky 的信。）

魯迅就是最真切表現現實暴露現實的天才作家，他用火炬一般的筆驅除了被偽善者和騙子們罩在現實上面的作偽的幻影，動搖了封建守舊勢力和頑固資產階級的欣然自得的太平天下，使大家對於現在的社會秩序由懷疑而憎恨，而反抗。但他不止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和帶有社會主義傾向

的文藝作家，他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戰團現實主義者和革命思想家。因此，他的著作不限於表現和暴露現實，他高舉了指引大眾變革現實的火炬。他批判和反抗籠罩中國民族的腐敗傳統，指示大眾注視那嚴重威脅自己命運的民族病態和社會黑暗，從辨明是非和分別憎愛之中堅決保衛光明戰線，反對黑暗主力；並且永遠向前看，以樂觀的自信沉酣於戰團的大歡喜中，他警告和感召廣大的革命羣衆，要他們養成堅忍奮鬥的韌性作戰精神，對敵人決不寬恕，決不姑息；但同時要明戰術，重實力，他反對一切夢游病式的空想主義，要求戰團大眾正確估計客觀情勢和主觀力量，並且從大處着眼來整飭革命隊伍，爭取戰團勝利。他反對一切機械看取事物籠統解決問題的公式主義，要求願意前進的人們清醒地剖析真實，具體地處理事情。他反對一切不尚實際的空談和自暴自棄的冷氣，要求大眾積極地實踐，嚴肅地工作。這些就是織結在他的思想中的現實主義經緯，就是他教育中國人民的現實主義課程的主要綱目。自然不用說，他的現實主義是始終烙印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顯著特徵的。

第二章 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魯迅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

一個徹底的思想革命家，必然是堅決的革命思想家；同樣，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也必然是熱烈的革命戰鬥者。魯迅是現代中國號召思想革命和堅持戰鬥現實主義最英明最強毅的先驅人物，他的思想不僅是中國人民要求進步渴望光明的意志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往前發展和走向深入的最明確的反映。誠然，他的作品很少包含「民主」、「民族解放」、「反封建」、「反帝」、一類的字眼，他的一生是思想活動多於革命實踐，但人們沒有理由否認他的思想和工作是徹頭徹尾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而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通過着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巨潮，終於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交織在他的一身。在這一章，我們要探討作爲革命的啓蒙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魯迅留給我們的豐富思想遺產，隨後，我們還要把這個巨人當作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來研究。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於清末，更新於五四，而壯大於大革命以後；魯迅身歷了多次的革命巨變，始終代表着中國被壓迫民衆，和阻礙人民進步的陳舊社會搏戰。他是舊中國的勇敢反對者和新中國的堅決催生者；是舊民族生活的銳利批判者和新民族風氣的光輝創造者。從民主革命的要求來看，在現代中國，魯迅之被歷史選擇爲偉大的「精神界戰士」（「墳」：摩羅詩力說），是絕非偶然的。這個巨人不但代表永遠前進的中國億萬人民掃蕩野蠻的中世紀的「舊威法」，痛擊奴役中華民族的異族壓迫勢力，並且指引廣大民衆怎樣去掙脫那桎梏他們的精神與生活的全部枷鎖，怎樣用最小的犧牲去博取偉大的戰鬥勝利。

在現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產生了若干卓拔的思想戰士和革命戰士。依照「蓋棺論定」的說法，在已故的歷史人物中，有兩個可以稱爲中國民主主義史上最不朽的偉人，一個是三民主義的創始者和執行者孫中山先生，另一個便是思想革命家魯迅先生。誠然，這兩個巨人有著各自不同的活動領域，孫中山的戰鬥事業是側重於政治實踐，而魯迅的戰鬥事業是側重於思想運動。就思想發展來說，孫中山先生基本上是一個民族民主革命者，而魯迅在晚年更接受了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主義。但是，這些並不妨礙在他們兩人之間，有著相似之點。首先，他們同是現代中國最有遠見和魄力的民族解放運動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們畢生爲爭取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爲解放被壓迫民衆而苦戰，在中國的政治啓蒙上和思想啓蒙上都作了最廣大的貢獻。第二，他們

都對勞苦大眾表示最深摯的同情，中國億萬農工的解放利益，特別為他們所尊重，愈到晚年，他們愈是推重勞苦大眾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力量。第三，他們的思想都不斷反映着時代的進展而向前進步，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因而也就不停滯於歷史的某一點上。中國革命運動越是向前擴展，越是深入羣衆，他們的戰鬥思想也越是充實而鋒銳。這兩個歷史巨人顯示其彼此相似之點，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要求從各方面（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產生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歷史從政治戰鬥中選擇了孫中山作為中國前期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從文化戰線上選擇了魯迅作為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領袖。他們出生在同一個苦難的中國，接觸着相同的被壓迫羣衆，面對着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革命要求，親近着同一方面的世界革命潮流，而且在晚年都和無產階級的戰鬥隊伍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規定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任務，誰能最堅決、最正確反映和執行這種任務，誰就可以成爲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代表人物。孫中山和魯迅恰像出現在同一星座運行在同一軌道的一雙巨星，他們的年齡不同（魯迅比孫中山小十五歲）和活動範圍不同，並不妨礙他們在現代中國以各自的偉大戰績互相輝映。

孫中山對於魯迅的影響究竟有多麼大，我們很難給予精確的估計，但從魯迅推崇孫中山的言論看來，不難得知魯迅是熱烈贊同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張的。在論及孫中山的時候，魯迅對於這個偉大戰士給予了最公允的評價：

「凡是自承爲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增加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行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

孫中山的「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的戰鬥精神，正是魯迅歷來歌頌的個性反抗精神。惟其因爲他禮讚不朽的戰士，也就咒咒那毀謗戰士的蒼蠅式的奴才：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還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戰士和蒼蠅。」）

後來，魯迅自白了他的這一篇「戰士與蒼蠅」的題旨：

「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集外集拾遺」：這是這麼一個意思。）

奴才對於戰士總是譏笑糟蹋，而戰士對於戰士總是愛惜保衛。沒有奴才，不能反讓戰士的光輝和偉大，沒有後起的戰士，不能顯揚先烈的壯烈和可愛。魯迅對於一切奴才毫不吝惜他的攻擊火力，而對於一切受奴才誣謗的戰士，則毫不吝惜他的辯護能力。他看穿了，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他死後，不僅受着某一類奴才們的譏笑，而且受着另一類奴才們的糟蹋。這些戰士的遭殃，正如他所說，「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隕之後，言行而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譏起，既以自衛，又以寶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釣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實際上，這種情形古今中外如出一轍。列甯就曾說過：

「在大革命家活着的時候，壓迫階級經常的緝捕他們；對他們的學說極端的憎惡，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在他們死了之後，便企圖把他們作為無害的神像，所謂把他們加入聖人之列，略略表彰他們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阻礙革命

學說的內容，磨滅這個學說的革命鋒銳，使它庸俗化。」（「國家與革命」中譯本。）
馬克思死後在歐美遭到奴才們的如此待遇，孫中山死後，在中國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魯迅憤慨地寫道：

「預言者，即先覺，每爲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嘆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實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着，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爲，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爲偉人時，他已經成爲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華蓋集續

編：無花的薔薇。」）

這裏只提到了孔丘、釋迦、耶穌基督的名字，但這些名字實際不過是孫中山和其他革命戰士們的代名詞。據說，魯迅在一處演講，就曾慨嘆孫中山死後被奴才們當作「偉人的化石」利用。

（這是以前聽友人王任叔兄說的。）現在，魯迅自己也作了「偉人的化石」了，那些嗡嗡營營的

蒼蠅，那些「謬託知己」的奴才，不正是以先前對付孫中山的老手法——更卑劣的手法——來對付魯迅嗎！

然而「完美的蒼蠅」決不能用他們的嗡嗡營營來掩住戰士的不滅呼聲。魯迅幼時的「法名」——長庚正象徵了魯迅在中國民主革命巨潮中的強大光輝。他真像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的長庚星（這比喻是自吳沫一篇文字中借用的），照耀在荒冷的黑暗的原野，指引廣大的被壓迫民衆奔赴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戰線。

魯迅出生在腐敗的封建社會中，他身受封建勢力的欺凌與迫害，目擊統治階級的殘酷與性儒，使他自小對舊社會生出憎惡和仇視的心情，這種心情和他的民族解放要求結合起來，就使他一開始便以主要的鋒芒對封建制度宣戰。

第二節 魯迅的啓蒙主義思想

魯迅在反封建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的思想是側重對於封建精神體系的攻擊。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強調國民性的改造問題，重視民族病態的揭發與療救。誠然，他對於國民性與民族病的瞭解，最初是比較抽象的，當時他還不能從階級關係的分析來發掘那造成中國社會衰朽的根本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無疑的，就是他對於舊社會以及支配這個社會的剝削

階級與壓迫機構，一開始就表示強烈的反對，他覺到「舊社會的腐敗」（「且介亭雜文」），「憎惡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二心集」序），因此他要對舊社會作「反戈一擊」（「墳」）。他痛恨那些欺凌弱者的壓迫份子與剝削集團，寄同情於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卑微弱小人羣，這種憎惡吃人制度，同情被害羣衆的風格正像一根紅線貫串在他的創作與論著中。「明天」中的單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藥」中的瑜兒（夏四奶奶的兒子），「狂人日記」中的迫害狂，「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長明燈」中的狂人，「離婚」中的愛姑，……這些都是他描寫的被迫害者的代表人物；他刻劃他們被舊社會踐踏凌虐的慘劇，教人悲憤，教人酸鼻。就是對於阿Q、孔乙己、陳士成（「白光」中的主人翁）這一類可笑而又可憐的典型人物，也並不遮掩他的諷刺以外的同情。反之，他對於趙太爺、錢太爺、錢洋鬼子、夏三爺、七大人、慰老爺……這一類的大人老爺，却是表示猛烈的憎惡，因為他們堆着「大小無數的人肉的宴筵」，以「愚妄的狂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墳」：燈下漫筆）。這一類的惡蟲從魯迅出生一直到他病死，都不斷蠕動在他的眼前，他最熟悉他們的骨相，也最熟悉那被他們蹂躪摧壓的卑微人物的靈魂。他用飽含敵意的筆刻劃吃人的惡蟲，剝露那爲他們寄生的腐敗社會的真面目，同時爲被凌虐、被欺侮的不幸人羣發出沉痛的不平。這種風格後來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雜文中。正因爲他深切地了解隱藏在舊社會胸懷的矛盾、猥劣、腐敗，熟悉吃人與被吃的殘酷現實，而

又不甘沉默，於是毫不猶豫地對舊社會猛擲投槍。這首先就不能不擊中封建毒龍的要害。他的反封建的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不是出發於抽象的理論與思索，而是淵源於現實的深刻考驗，特別淵源於他對於人吃人的舊社會的精密觀察。這就說明了爲什麼他的全部思想發展過程和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合拍，更說明了爲什麼他的民主主義傾向終於和革命的社會主義匯流爲一。

從魯迅的早期作品中，不難看到，他的反封建的火力是集中於攻擊封建的意識形態，在辛亥前夜是如此，在五卅時代更是如此。就是到了晚年，雖然他所攻擊的對象比先前廣大得多，但仍沒有放鬆他對於封建守舊意識體系的攻擊。在一向缺乏民主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的中國，攻擊根深蒂固的封建守舊意識，打破地主紳士階級桎梏人民的精神統治，正是進步智識份子最必要的而又最自然的職責任務。帝國主義的橫暴闖入，在中國誠然造成了「亘古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然而它並沒有沖去淤積在中國民族生活河道中的封建主義污泥，反之，它用這種淤泥築起了防止中國人民革命與進步的反動堤防。封建統治者不僅利用政治和武力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壓榨人民的血肉，而且利用最野蠻、最猙獰的思想統治，來麻痺人民的活動能力，奴役億萬不識不知的愚衆，這樣來維持他們在殘山斷水之間的荒淫貪婪的獸性生活。他們是極端殘酷橫暴的，同時又是極端卑怯花弱的。吃人的倫常禮教，守舊的儒教孔道，陳腐的「祖傳」「老例」，這些都被他們利用來作爲桎梏人民的精神鎖鏈，而且都爲帝國主義所支持，所援引。廣大人民沉陷在

馴順、愚昧、自救、懦弱、猥鄙的麻痺狀態中。不能打脫這一類的精神鐵錐，人民就不能自覺地起來揮動他們攻擊舊中國的臂膀，就不能在舊中國的廢墟上創建富有生氣的新中國。魯迅正是最堅決號召大眾反抗封建主義精神統治的偉大戰士。他在清末，就已注意到喚起人民的自覺（所謂「自覺之聲發，每響於人心，清甯昭明，不同凡響。」——「摩羅詩力說」），致力於攻擊愚民統治與奴才傳統，反對「安弱守雌，篤於舊習」（「墳：文化偏至論」）的國民精神狀態。但這種呼聲隨即沉沒於當時的守舊主義的死水中。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孤獨的「沉思」，他終於在五四時代找到了反封建的文化隊伍。從那時候起，他就沒有停止過反吃人禮教和守舊傳統的鬭爭。他猛烈進攻「屠殺現在」的僵屍，衝破「傳統思想的長城」，剝露所謂國粹主義的木相，主張用科學和合理思想的血液注射到中國民族機體裏，徹底排除那潛伏在中國文化血脈內的毒菌。他沉痛地慨嘆道：

「老大的國民儘在僵硬的傳統裏，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於是外面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華蓋集：忽然想到。」）

要推翻這「僵硬的傳統」，須要徹底的變革，這就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墳：再謂雷峯塔的倒掉。」）一切「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言

語」，「侮蔑盡現在」的倫常，「堆在道路上的祖傳，老例」，……都要毫不可惜地掃除掉。

魯迅是第一個指出中國舊社會支配者有意識地用思想廢棄來執行愚民政策的人。他深刻認識了封建統治階級是如何巧妙用他們的意識形態來籠罩被治大眾，而被統治的民衆又如何不自覺地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來當作自己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前已經道破了這一真理）。例如一九二五年他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時，就曾說過：

「平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統治階級就利用了民衆的這種弱點，來從精神上加緊對民衆實行壓迫，以鞏固其野蠻的統治。中國反動剝削者及其走卒們（所謂「閹人」、「土等人」、「正人君子」之類）慣于提倡各種反動的復古思想和守舊精神，但他們自己却並不信守這些，他們祇不過是拿這些作爲欺騙和禁錮民衆的符咒。魯迅揭穿了這種虛偽的鬼把戲：

「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同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却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爲「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

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正是中國的「做戲的虛無黨」的卑劣特點之一。他們自覺地用扮戲的醜惡姿態來欺騙羣衆，遮掩自己的卑鄙齷齪。但是因爲民衆被麻醉太久了，不容易看穿他們的虛偽，於是被他們所利用的「傳統的權威」壓迫得不見天日。撕破他們的偽裝和假面，打翻那蒙蔽大眾耳目的「傳統的權威」，這正是一切民主主義者最重要的啓蒙任務，魯迅正是最果敢地執行這任務的殊勳者。

魯迅正確估計了封建意識形態對於人民的危害作用，但他深信反動統治者要依靠野蠻的精神統治來維持自己的剝削制度與壓迫權力，是決不可能的，理由是，他們「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墳：春末閒談。」）這正是一切反動統治者不能補救的遺憾。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那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國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國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墳：春末閒

談。」

正因為人民大眾不盡是自甘居於奴隸地位的，所以「國人的天下一時總難得太平。」（同上。）魯迅對中國人民並不絕望；他熱烈地相信憑着人民大眾自己的「猛志」與「實力」，是一定可以衝決統治者所設的天羅地網，顛覆「國人的天下」的。「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熱風」，自覺的人民大眾「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同上。）大人老爺要想熄滅那燃燒在大眾頭腦中的反叛思想，豈非枉費心機嗎？

但魯迅認為黑暗的逆流阻力太多，喚起民衆的覺醒和敵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進步份子有系統地堅忍地進行艱鉅的改革事業。他說：

「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魯迅所說的國民性的改革，就是在粉碎反動統治者的精神牢獄的戰鬥中，創建民衆自己的意識形態，來代替腐敗社會的「精神文明」，這是一個艱鉅的啓蒙事業。但是依靠中國的固有文化，決不能執行這種事業，因此只有輸入西洋文化的血液，才能療救中國民族的精神敗血病。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就曾指陳：「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墳」：摩羅詩力說。」）在五卅時代，他更勇敢地喊出打破舊偶像的口號。他力說：「舊像愈摧破，人類便

愈進步。」（「熱風。」）他不但堅決反對一切閉關主義，而且也猛烈攻擊「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的中體西用主義。誠然，在當時，他還沒有接觸到國際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與歷史觀，他祇能從西洋資本主義的科學與文明的武庫中取出對抗封建反動精神統治的武器，他說：「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 Apollo。」（「熱風：隨感錄」四十六。）因為他認為「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同上書：「聖武。」）在五卅啓蒙運動的初期，用西洋資產階級的文明來對抗封建的古舊文明，在客觀上自有其進步的意義。那時中國勞工階級還沒有在政治和思想上樹立鉅大的領導力量，農民也沒有顯示其自覺的戰鬥力量，厭惡封建文明和嚮往光明的進步智識份子採取西洋的文化武器，來打碎那桎梏人民理性的精神鍊鎖，正是必然的事情。然而在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以後，新的科學世界觀與科學歷史觀逐漸代替了歐美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優惠地位，舊的精神武器就不適用了。魯迅終於明確看出了，在世界對立着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即沒落資產階級的文明，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即新興無產階級的文化；前者支持中國反動的封建文化，麻醉中國人民的覺醒，後者武裝中國人民的頭腦，推進民族解放與民主革命的偉大戰鬪。魯迅選擇了後一種文化體系來加強和刷新中國的理性運動——啓蒙

運動，雖然同時並不拋棄西洋進步資產階級的文化成果。他不但熱烈地提倡新啓蒙運動，而且辛勤地介紹國際新興的文藝理論與文藝作品。他屢次指出社會科學理論介紹到中國的必要，領導以無產階級爲中心以人民爲本位的大衆文化運動，幫助進步文化運動者改正了許多認識上和策略上的偏頗與錯誤，哺育了許多新進的文化幹部。凡此都是他的新理性主義在新民主運動中的戰績。但是，他深知中國幾千年的舊社會傳統乃是積滯在歷史河道裏的厚重淤泥，不能清除這淤泥，疏濬人民大衆的自覺的源流，要完成巨大的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列甯就曾說過：「習慣的勢力沾染千千萬萬的人，是一種可怕的勢力。」（「什麼是人民之友」。）魯迅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案即列甯——心）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以爲改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疑爲「但我想，倘不將這些改革」之誤植。——我所根據的是「全集」版——心），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二心集：習慣與改革。）

這裏自然不可把魯迅的意思從唯心論的觀點加以曲解，他並非說先要改革風俗和習慣，再來發動革命，而是把這些改革作爲整個革命事業不可忽忽的任務。舊的習慣勢力如果在革命後仍然頑強地存在，不能和統治者的崩潰一同崩潰，就證明革命尙未成功，證明反革命還在伺隙反攻。要打破那阻塞歷史川流的封建舊習慣，須要一切民主主義者和啓蒙運動者深入人民衆的生活，實踐

艱苦的民衆教育工作。魯迅寫道：

「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引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同上書。）

一切反封建的理性主義運動，都沒有超越民主革命的任務。魯迅從開始啓蒙工作起，直到接受社會主義策進新理性運動爲止，不曾一時停止過反對舊中國的「精神文明」的戰鬥，這種戰鬥執行得比任何人堅決有力，它給予中國民主革命的影響幾乎是看不見的，然而却是異常深刻廣大的。今天活躍在中國革命最前線和轉戰於文化思想戰場的青年，幾乎沒有不受過魯迅的直接或間接的薰陶。他的輝煌的理性主義和現實主義，跟革命大衆的戰鬥生活熔合爲一，鑄成了新中國的革命風紀。一切頑惡的舊中國寄生蟲和兇殘的中華民族敵人，都不能動搖這崇山般的風紀。

凡是反封建的理性運動和民主運動，總是離開不了人的權利的尊尙的。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曾在革命旗幟上大書人權自由等類的字樣，中國的革命運動也有過類似的情形。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家和政治煽動家，很少不是在那裏宣揚着抽象的人權論和人道主義，他們往往懸想着一些抽象的人權原則；待到勞動羣衆自覺到現社會的壓迫和剝削和此等原則相衝突，而起採用鬭爭力量要求真實的生活權利和自由權利時，便遭受到過去人權論者或他們的後繼者的暴迫害。顯然，抽象的人權主義和人道主義本身就包含了和大衆利益不相容的矛盾。

魯迅也是堅決揭發人權思想來對抗吃人的封建社會壓迫的，然而他的人權思想大體上不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主要是從具體的現實出發的。不錯，他早年接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紹介過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學說（如「苦悶的象徵」等），翻譯過阿志巴緩夫的虛無主義作品（如「工人緩患略夫」等），這些思想、理論與作品和魯迅的現實主義風格本來是衝突的。然而在他尚未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武庫之前，爲了要從封建專制主義的濃重黑暗中打開一條出路，他祇能墜入這些泥漿，加以蒸餾，聊以慰藉在寂寞和饑渴狀態中跟黑暗搏鬥的戰士。他在輸入這些東西之時，或許沒有覺察到它們的毒害。他所能看到的，是它們在反封建的光照中和自己本相不盡相符的近似美妙的擴大投影。因此，他從尼采那裏強調了反因襲和個性解放的精神，從厨川白村那裏強調了反權威和「生之歡喜」的思想（厨川白村的思想不過是叔本華、尼采、卡奔特 [K. Carpenter]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等的哲學思想在文學理論上的混合表現），而從阿志巴緩夫那裏強調了反社會迫害和主張報復的性格。我們固然不能妄用那與康有爲式的「托古改制」相對的「托洋改制」四字來形容魯迅早期的思想，但魯迅從某些外國思想學說的投影中擷取二三點，和他的現實主義思考銜合起來，作爲攻擊舊社會的火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錯誤的有毒的學說，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有時也可以通過歷史的折光作用，作爲一個思想家走向真理之門的意外的誘導力。達爾文因爲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悟到物種的生存競爭（自然，倘使誇大這一點，把馬爾薩

斯的人口學說當作達爾文的思想泉源，那就是韓非子所說的「非愚即陋」了，便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佳語。在現代世界文學史上，我們看見高爾基也會受過尼采的影響（日本文藝批評家昇曙夢曾經有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見他的「高爾基的思想爲人和業績」），然而這並不妨礙他成爲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魯迅在早年部分的接受了尼采他們的影響，是和達爾文受到馬爾薩斯的影響相似的，尤其和高爾基受過尼采的影響相像。假如他不是依靠中國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和理性主義火光，不是憑藉自己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眼力，來輸入尼采等的學說與思想，他就會變成尼采等的奴隸，而決不能作爲中國偉大的啓蒙導師。當中國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尖銳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勞苦大眾利益相抵觸之時，魯迅就毅然決然拋棄了尼采他們的影響，而虛心地學習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武器，並且很巧妙地運用牠們來打擊「黑暗的主力」，這就是魯迅的可貴的蛻變，而這蛻變正反映着中國革命現實的血肉。

第三節 魯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

魯迅從鮮血淋漓的現實中看清了舊社會和它的支配者的殘虐和卑劣，因此，他要否定過去的，一切因襲與傳統，這不僅是指前面所說的封建精神統治和反動意識形態，而是包括全部的封建專制統治。但他的否定封建統治，並非出以抽象的說教，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剝露中解除反動權威

的盔甲，使一切吃人的僵屍赤裸裸地站在大眾面前受嚴酷的拷問。他往往只是用筆和舌對吃人者提出公訴狀，而讓他的讀者與聽衆自己去審判他們，但他決不吝惜他對惡勢力的刑罰與攻擊火力。「狂人日記」是他第一次控訴舊社會的吃人罪狀的文書。他暴露了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不過是吃人與被吃的歷史，而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國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墳：燈下漫筆。」）在野蠻的吃人制度之下，「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喫，但也可以喫別人。一級一級的制服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同上。）這就使舊中國充滿了暴虐、貪婪、自私、欺騙、愚昧和麻木狀態，這些膿血淋漓的「精神文明」歷來就被反動統治者用仁義道德的錦繡包裹着。他們把民衆壓在「精神文明」的古舊長城底下，爲的是要維持他們的吃人特權。推翻吃人的「精神文明」，掃蕩人面豺狼的吃人特權，爭取真實的人的權利，不正是中國人民實行自救的唯一道路嗎？魯迅把他的解放人民的希望寄托在全國青年身上，因此他大聲疾呼：

「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春末聞談。」）

顯然，他所要毀壞的，乃是建築在骷髏上的舊中國，而決不是如虛無主義者眼睛裏的整個中華民族。「所謂中國者，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句話，除了用來攻擊那烹人肉的

舊中國，抗議吃人的舊制度而外，難道還有別的意義嗎？假如魯迅所要掃蕩的，是他的「虛無主義」與瘋狂發作時所見到的整個中國，那末，他又爲什麼要吟着熱淚來鞭策中國前進呢？爲什麼又要痛斥那些失掉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的軟體蟲呢？

列寧在論及孫中山時，曾經說過：「孫逸仙綱領的字裏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絲毫沒有不問政治甚至絲毫輕視政治自由的態度。」（「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評價魯迅。（只要把「綱領」兩字改爲「作品」。）他的啓蒙主義和理性主義並不妨礙他在作爲思想革命家時，同時作爲革命思想家，反之，它們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血肉相連的。魯迅不但自己絕不輕視政治，而且最憎惡那些自命清高不屑過問政治的超然派。他不但民主政治的激烈主張者，而且到了晚年，成了一個卓拔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國際主義者。在「菜薇」那篇速寫小說裏，魯迅諷刺過那些輕視政治的超然派與中間派，你看他寫得如何辛辣：

「他們不配我來寫，」他說：「都是渾蛋。」跑到養老堂裏來，倒也罷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陽山裏來，倒也罷了，可是還要作詩；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守己，爲「藝術而藝術。」你瞧這樣的詩，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採牠的薇菜，

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道的不對。

神農、虞、夏一下子過去了，我又那裏去呢？

唉，死罷，命裏注定的死氣！」

「你瞧，這是什麼話？溫柔敦厚的才是詩。他們的東西，却不但「怨」，簡直「罵」了。沒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況只有罵。即使放開文學不談，他們撤下祖業，也不是什麼孝子，到這裏又譏誚朝政，更不像一個良民，……我不寫……」（「故事新編：采薇。」）

在這段諷喻裏，映現了一個堅決的民主政治者和社會主義者重視實際政治的戰鬥姿影。他從來不掩飾他的寫作和言論是跟現實政治血肉相連的。他的大半生沒有停止過對反動統治者的「罵」，沒有停止過「譏誚朝政」，這就使他成爲「關人」眼睛中的「不祥火鴉」，終身受到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他所遭遇的命運恰正是一般被壓迫大眾的共同命運；他所咀咒和攻擊的敵人，也正是一般被踐踏者的共同敵人。然而可笑的是，那些嘖嘖營營的「完美蒼蠅」，却在罵魯迅爲刀筆吏和罵人專家了。便是那些以「公正」面目出現的高人雅士，也在爲魯迅歎惋，可惜他浪費筆墨在罵人的事情上。他們不能也不願了解，魯迅的「罵人」乃是他的政治鬥爭的形式之一種。（自然這裏應該分別他對於民衆敵人的攻擊，和對於文化戰友的規諍，不能把兩者混爲一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孫中山……這些偉人都曾在實際政治鬥爭中對敵人作過

酷烈的怒罵和嘲諷。假如罵人者和被罵者不是超現實政治超階級敵對的怪物，憑什麼證明罵人是一個戰士的偉大是不相容的呢？

在魯迅還沒有成爲一個自覺的社會主義者之前，他是一個最奮勇、最清醒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民主主義愈到晚年，愈加鋒利結實，而在五四時代和大革命時代，他的民主主義和理性主義有一種特別親密的結合，這種結合表現在他反對奴隸主義反對復古運動和伸張人民權利的言論中：

「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章喫，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够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老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爲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

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墳：燈下漫筆。」）

正因為「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少數「主子」當做牛馬算帳，至多是由牛馬升為奴隸。因此在「亂離之世」，就成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在「太平盛世」，就成了「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同上書。）絕大多數的人出沒在奴隸生活狀態中，少數占有吃人煮人的「厨房」的特權者，便在千千萬萬的骷髏上荒淫縱慾；他們要使

被吃者永不自覺，永不反抗，而且「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的讚歎他們」（「朝華夕拾：狗彘鼠」），便施行極端殘刻惡毒的愚民政策，來穩定他們的「愚民的專制」；

「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纔漸漸近於正經的活人。」（「華蓋集：忽然想到。」）

所謂「愚民的專制」正如周揚所解釋的，是「一種肉體的奴役加上精神的奴役，必使被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吃，而被吃的人，同時無意中也在吃人。」這種「愚民的專制」主要是建築在封建主對農民勞動者的殘酷的超經濟榨取上；和土地剝削關係結不解緣的商人資本恰恰增強了此種榨取，後來的買辦資本更加深了這種奴役。剝削者不但利用經濟力量，而且利用特有的「精神文明」來長期摧殘民衆的理性與人格，用軟硬兼施恩威並用的統治手段，迫使被治者匍伏在他們的脚前，捧獻自己的血和肉，供他們狂飲大嚼，隨後還得感謝「皇恩浩蕩」。吃人的和被吃的像

各色各樣的魚羣似的，叢集在一湖死水裏，大家都呈現「死相」，缺少生氣。魯迅憤然揭露了這種吃人與被吃的慘情，他要使一切被人吃而又無意中吃人的大眾認識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他在論及蕭伯納的時候，曾經說過：「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裏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爲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牠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牠爲特別偉大的蛆蟲則不可。」（「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這段用來稱頌蕭伯納的話也可借用來評價魯迅自己。正當「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在一湖死水裏「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的時候，魯迅驀地跳到水面上來，他大喝一聲道：「這些都是吃人和被吃的魚！」自然，他也是從死水裏浮上來的，然而我們非認他爲特別敏感，特別勇敢的魚不可。

但魯迅並不止於勇敢指出吃人制度的慘酷，他更進一步號召大眾用動作和反抗，把自由的洪水引進死湖似的中國。他說：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掙這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

論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六。」）

只有用堅決的韌性戰鬥，「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使中國脫胎換骨，蛻去那層慘白污臭的表皮，呼吸新時代的空氣，才能取得「生存」，「溫飽」，「發展」的保證。如果從民族的要求來解釋，那末，他的所謂「生存」，「當然就是「民族獨立」，所謂「溫飽」，當然就是「民生幸福」，而所謂「發展」，當然是「民主進步」，這三者是不可分開的，在他看來，要測量各種文物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價值，是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國粹」，因為「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熱風：隨感錄二十五。」）這和一切復古衛道的「國粹」派剛巧相反，因為國粹派是要用死人的力量拖住活人，使青年人為舊中國殉葬，而魯迅是執着「生之歡喜」，一切爲了生存，爲了溫飽，爲了發展。只有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才可解釋魯迅攻擊吃人社會的本意，一切把魯迅譏諷爲發洩孤憤的虛無主義者的論客正是魯迅的罪人。

魯迅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猛烈攻擊者，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熱烈追求者，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時代，對革命懷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並且一度參加過光復會。（周作人說他沒有參加光復會是不對的，因為據景宋、許壽裳諸先生所說，魯迅先生確曾做過光復會的會員。）然而辛亥革命的流產，使他感到悲憤。他描寫辛亥「光復」後最初的形象說道：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朝華夕拾：范愛農。」）

辛亥「光復」後，豈止紹興一地的情景是如此，全中國都不是「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嗎？」那些山地主紳商包辦的反動政權，不是在最初的白旗和後來的五色旗之下繼續維持吃人制度嗎？「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墳：燈下漫筆。」）在「阿Q正傳」裏，魯迅描寫光復後，舉人老爺在那裏幫辦民政，把總依然做著武官，一切官僚制度「一仍舊貫」，所謂改革至多是表現在頭髮上，即「枉然失去了一條辮子」，或者如阿Q似的「用竹篦盤上他的辮子。」（「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魯迅在「頭髮的故事」那篇小說裏，就帶着強烈的諷刺意味暗示革命流了許多血，其最大收穫不過是得到了剪辮子的自由。後來，他又用幽默的語調寫道：

「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啟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爲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爲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牠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然而他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啟舌，恐其衰微」的熱情烙印着他的文字思想，依然是不可掩藏的。他最引爲痛心的，是費了巨大的鮮血代價所換得的中華民國，依然被黑暗的統治籠罩着。

「頭髮的故事」有一段寫道：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縱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記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吶喊：頭髮的故事。」）

被割子手和「正人君子」繼續統治的中華民國，依然是充滿着奴隸的悲鳴與呻吟，廣大的農民和勞苦大眾受着殘酷剝削者的踐踏與鞭撻，一般人民仍舊度着鐵索錘鐺的不自由的愁慘生活，人的權利變成棄在路上任人畜踐踏的藥渣。在這樣的慘澹局面之下，中華民國的靈魂是黯然失去了。魯迅寫道：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就·受·了·奴·隸·的·編，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踐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一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

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三。』）

這裏橫溢着一個懷着高度正義感的智識份子的悲憤，甚至閃爍着他的夾雜着諷嘲的哀愁，然而有誰能否認這裏沸騰着一般被壓迫民衆的憤激而淒苦的心聲。「什麼都要從新做起」，不正是過着奴隸生活的廣大人民爭取解放的唯一出路嗎？那些用斷章取義的卑劣技倆證明魯迅「徹頭徹尾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的論客們，懂得什麼叫「從新做起」嗎？

自然，我不是說魯迅早年的文字裏沒有憂悵和失望的暗影，騙人者兼吃人者用烈士的血花換來的勝利，戰士們（如他後來所說的「孫中山先生及其他先烈們」——見本文前段）遭受奴才們侮辱和殺傷的慘史，民衆們在無邊的刑場和牢獄中的哀號，使期待光明而慘遭打擊的猛士不由不震悚和憤慨；當震悚和憤慨不能或不願用直接形式表達出來時，從心坎裏湧出來的諷嘲，很自然會誇張那空迫着光明勢力的現實陰暗面（藝術家是懂得誇張手法在藝術上的效用的，然而很少有戰士們懂得誇張（不是過高估計敵人）在戰國上的效果的），於是熱狂的諷嘲在現象上就顯示爲陰冷的憂悵與失望。魯迅是一個富於熱情的剛毅戰士，他永遠不會對人生絕望，故意裝着多愁善感

的面貌，用主觀的灰黯感去渲染世界，在他是不屑為的。然而當橫暴的黑暗雲霧暫時掩住了新生的陽光時，他便不免將嚮往光明的爽朗熱情壓縮在他的誇張黑暗面的諷嘲裏。由於他早年尚未接觸到浩浩蕩蕩的勞苦大眾艱險，使他看到的黑暗經常對光明占上風，這就更令他的作品和議論帶着「熱得發冷的熱情」，此種熱情在現象上常常表顯得陰森逼人。譬如他有一次對民國發過如次的感慨：

「啊，造物者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根毫毛！」（「吶喊」頭變的故事。）

後來他又描寫自己在民國初年的心情：

「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魯迅誇張了現實的黑暗面，同時也就連帶誇張了自己的失望情緒與懷疑態度。然而這不過是他的心胸的一面，在另一面正躍動着他那不甘被黑暗淹沒的積極看取人生的情趣。他在描寫了上述的失望心情之後，接着又說：

「不過，我却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很有限的，這想頭，

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同上。）

這裏，很坦白地解剖了他的懷疑心緒的根由。當他不久接觸到無數有爲的「人們」和無數悲壯的「事件」以後，他的戰國豪情就以異常奔放的雄姿傾瀉在人生的戰場裏了。不過，必須指出，即令在他用懷疑的眼光看取現實的陰暗面時，他也並沒有掩藏自己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行進熱情。他在作品裏之所以要「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以上均見「自選集自序」），有時「不值用曲筆，在「藥」的玲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吶喊：自序」），不僅如他自己謙抑地所說的「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正做着好夢的青年」（同上），或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馳奔的戰士」（同上），而且分明是由于他深信：「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爲生命是進步的，樂天的。」（「熱風：生命的路」）。本着這種自信，他就不忍教大眾長久逼視暗與冷的煙塵，他要插點大眾盼望光與熱的遠景，讓人們能够清醒找到歷史進展的道路。因此他雖然痛烈地斥罵和詛咒舊中國的沒出息，「不肯自己改變一根毫毛」，可是他毫不抑低他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力與民族自尊心。這種態度越來越鮮明地表現在他的諸論和作品中。他在大革命時代這樣歌唱道：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而已集：黃花節雜感。」）

大革命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巨大覺醒，掀起了全國的爭自由的浪潮，使他對正在生長的新中國充滿了光明的熱望。舊時的陰鬱色彩從他的作品中褪去了，在他的文字裏閃現了新中國的面影。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後，他又不時吐露出陰慘逼人的悲憤，然而那悲憤正像隱藏在冰雪中的炸彈的爆裂，它使人震悚，使人不自覺對慘酷的現實生出反抗的心情，同時不得不去檢討過去失敗的血史。在他積極參加和領導集團主義的戰鬥隊伍之後，他的以大衆的憎愛爲憎愛的生活態度，使他對人生，對中國，對世界投射了比前更明快、更爽朗的熱愛光輝。假如說，在以前他對現實黑暗面的詛咒和攻擊幾乎湮沒了他對光明的詠歎與讚美，那末，在他成爲集團主義的主將之後，他的歌頌光明的豪情和痛擊黑暗的勇氣，就像兩股異常澄碧的山泉在亘川中交流起來了。一九三三年楊杏佛被刺，他寫了一首悼楊的詩，是：「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似乎當時頗帶有感傷的氣氛，但其實這正是魯迅的戰鬥豪情最奔放的時期。同樣地，他對於柔石等的紀念文（「爲了忘却的紀念」）的哀想悽惻也不能掩蓋他的豪邁氣概。正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他特別發揚了那最可寶貴的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

「有人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寫最初的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前，他過着一段發伏的生活，對人生的失望和在思想上的懷疑，使他甚至不能寫作。「狂人日記」以後的「吶喊」和「熱風」的時代，他成了反封建的積極的戰

士。這時他的文字就鋒利，明快，而有生氣。當他作「徬徨」、「華蓋集」時，憂鬱的思想又籠罩了他，雖然也在戰鬥，但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爐火純青時代，其實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後，創作固然沒有了，但「偽自由書」之類的雜感文裏，却表現着他的文字藝術登峯造極，而影響也最大。」（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戰士。」）

艾思奇所引的這個或人的意見（不是艾思奇本人的意見），對魯迅不免有誤解之處，例如他說在魯迅寫作「徬徨」與「華蓋集」時，「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對於「徬徨」與「華蓋集」的評價是不恰當的。大約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也就是魯迅寫「徬徨」和「華蓋集」的期間，是他和北洋封建軍閥官僚及走狗式的文人學者作孤軍困戰的時期，那時五四時代的文化革命戰線起了分裂，五四健將「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他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的這種巨大變化，使他懷着「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同上）的寂寞心情。正像他在「題徬徨」的那首五言絕句裏所表現的：「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集外集」。）因此他感覺到，這一期間他的文字「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義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自選集序。」）在如此的心境之下，他不能不把過去五四時代洋溢的戰鬥熱情

暫時壓縮在他的分泌憂鬱感的筆底下，同時不能不用轉灣抹角的曲筆來表達他對於舊社會與惡劣力的厭惡與抗爭，這樣就產生了他的「徬徨」，「野草」與「華蓋集」，實際上收集在「墳」裏的好幾篇雜感文也是這一時期的產品。這一期間的文字固然常常掩映着悲鬱與蒼涼的波影，然而在那波影底下，却分明潛流着他的從五四雷雨過渡到大革命暴風雨的期待戰友的長征情熱，這樣的情熱，是大革命暴風雨到來的前夜與初期一個「荷戟徬徨」者的正義感與求友慾的合流，是一個追求光明和戰取新生的民族鬥士永遠前進的內燃力量，因為它不能直接洋溢到戰鬥生活的表面上來，不得不隱藏在濛濛寂寂的波光之下，就特別易使人們感到當時魯迅的文字充滿着感傷和悲絕的氣氛。然而說他的這一時期的作品破碎無力，那分明是不能服人的。只要舉出「徬徨」中的「祝爾」、「示衆」、「孤獨者」、「傷逝」、「野草」中的「這樣的戰士」、「復讐」、「淡淡的血痕中」，「華蓋集」中的「忽然想到」（特別是五至六）、「夏三蟲」、「戰士與着蠅」等篇，就可以反駁這種粗率的論斷。而同一期間寫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雜憶」、「論時了眼看」、「再論雷峯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雜感文（後來都收集在「墳」裏），都是閃爍着革命真理的工作；正如瞿秋白所批評的：「墳」以及整部的「華蓋集」……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統治階級的火燄。」（論「魯迅雜感」——注意：瞿秋白所評述的只以魯迅的雜感文爲限，因此「徬徨」與「野草」沒有提到。）只要是善於讀魯迅的文字的人，應當承認魯

秋白的批評是對的。

然而，在前引的一段意見中，我們承認有一點是說對了的，就是魯迅的思想和情懷經過了幾度轉變，這種轉變過程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文字的內容與情調。大革命失敗不久之後，他從實踐和理論上解決了「新的戰友在那里」（「自選集自序」）的苦悶問題，於是採取正面打擊黑暗的戰鬥方式，和人民大眾的內外敵人鏖戰，他的筆鋒正像出鞘的新刃，直刺入民眾敵人和民族世仇的內心，這和他在過渡期間帶着陰鬱和懷疑的色彩的筆調是兩樣的。在某種意義內是回復了五四時代的明快犀利矯健剛勁的作風，但他的晚年的文字，却又不同于五四時代的文字，因為它對於現實的反應特別敏銳、廣泛、深刻、有力，它表現了新人羣的悲苦、怨憤、掙扎、覺醒、怒吼、衝突和苦戰，泛溢着鮮爽雄壯的集體主義朝氣；恰像統統前的洪鐘聲引起山鳴谷應，使漏夜在荒野長征的人群忘了寂寞和倦怠，而想起了曙光不久就要照臨，因而更堅定了並整飭了一同前進的步武。

魯迅的民主主義思想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於他處處以人民為本位，堅決主張用人民的自覺與行動，來對抗反動統治者的專橫與壓迫。他認為一切反動統治者及其思想代表所想到的「治國方法」，「都是爲了治民業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爲民衆本身的，却一點也沒有。」（「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

（「老調子已經唱完」）人民不應對壓迫者懷着任何幻想，因為摧殘民衆，阻撓改革，正是一切壓制者共同的本相。例如他在論及袁世凱時，曾經這樣說：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說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僕」變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偽自由書：殺錯了人異議。」）

袁世凱正是一切殺人的壓迫者的代表人物，革命民衆流了自己的血，將那些欺弄人民的大騙子浮上治人者的寶座，到頭不免要吃大苦頭。因此，他剴切指明，人民唯有用獨立的戰鬥去反抗壓制者：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小百姓）想到了自己的力量。」（「南腔北調集：談金聖歎。」）

魯迅始終不鬆懈反壓迫制度的鬭爭。他的筆和舌總是不斷對準黑暗的政治力量噴出攻擊的火

徽。他把一切「狼吞虎嚥」吃盡民脂民膏的民賊稱爲「坐寇」（「談金聖歎」），把那些譏笑毀謗民主革命戰士的奴才稱爲「完美的蒼蠅」（「蒼蠅與戰士」），把那些幫忙反動統治欺騙羣衆的文士稱爲「掛着小鈴鐺」的「山羊」（「一點比喻」），把那些用虛偽的「人權論」來粉飾黑暗政治的幫忙文人稱爲「救火的鸚鵡」（「王道詩話」）；把那種「叫民衆看見是民權，而民衆祖宗看見是忠孝」的虛偽參政制度稱爲「兩面光滑」的「藝術」（「最藝術的國家」）；這一類的諷刺在反對黑暗政治與壓迫制度的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特殊的武器作用。

正因爲魯迅從來不輕視政治鬥爭，並且特別反對「超于政治」的偏見與空想（見「魏晉風度及酒與藥的關係」與「論三種人」等篇），所以他的民主主義始終是帶有一貫的革命性與戰鬥性的。他在青年時代就特別歌頌「惡物悉顯」的「破壞」，見「摩羅詩力說」，而激烈攻擊那些維持現狀「嫉視破壞」的庸夫俗子；但他所讚美的破壞，不是「寇盜式的破壞」，也不是「奴才式的破壞」。（「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就是「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的綏惠略夫主義，他也同樣不贊成。（見「華蓋集續編：記談話」。）他頌揚「將舊軌道……一掃而空」的「革新的破壞」（同上），同時反對，「在瓦礫場修補老例」的改良主義，這就是他的徹底革命思想的要點。當大革命前夜北京反動在政府用屠刀維持黑暗的統治時，他預見了在壓迫和黑暗繼續增加中，「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份子，爲將來新的變動的萌蘗」（「兩地書」），他同時斥責

了那些詆譭革命的無恥調言（如「講革命是爲的圖利」，「過激派共產公妻」之類。見「聯查集：論辯的靈魂」）。在廣州時，他謳歌革命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因爲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他讚美爲民族和社會奮鬥犧牲的革命家說：「我深深感到革命家的偉大……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而已集：黃花節雜感。」）在大革命暴風雨過去以後，他領導中國的大眾文化運動，在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上作了許多不朽的貢獻。一切黑暗主力的衝鋒和喉舌，一切吃人惡魔的幫忙和幫閑，一切自命爲「折中，公允，調和，平正」的紳士學者，一切幻想「離開戰鬥而獨立」的「第三種人」，一切「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全都逃不過他那鷹隼似的眼睛，逃不脫他的嚴厲的攻擊和批判，他的革命實踐更磨銳了他的革命思想的鋒刃。

魯迅的民主主義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發展的反映與產物，但它轉過來又經過無數青年的傳播與文化運動的發展，充實了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內容，增大了中國民主主義思潮的活力。他的民主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帶着科學的理性主義和戰鬥的現實主義；新理性主義使他成爲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思想革命家，而新現實主義則使他成爲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和革命思想家。

第三章 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

第一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

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民主主義，和它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以交互滲透的作用統一起來的。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不能不帶有反帝國主義、反異族壓迫的民族主義色彩，另一方面，革命的民族主義，也不能不含有「反對壓迫的一般民主主義內容。」（列甯。）魯迅的思想和工作是最生動最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革命特質的。這個一身兼爲思想革命家和革命思想家的戰士，不單用藝術的形式和政論的內容之織結來標出他的思想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最明細的筆觸表現了中國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交流與進展。

中國古老的社會秩序，在外來侵略者的播壓之下，日益趨于潰爛，早在清末已經成了極顯明的死症；甚至連頑固的反動統治者也感到中國遭到「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李鴻章）；「王申奏摺」，感到「天下之變岌岌可危。」（張之洞）；「強學會序。」然而，他們傷悼腐爛社會秩

序的哀鳴絲毫不能表現民族主義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們正企圖以夷制漢，「用西洋物質文明的纏帶來包裹中國殘餘封建制度的爛瘡」（拙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這就是洋務運動的本質。後來，以康、梁、譚為領袖的新黨用了比較開明的手法，想在滿清王朝試演變法維新的御前戲，他們提出了立憲國會說，要求皇上「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康有為），相當代表了市民層的進步要求，可是他們實際不過是帶着二重奴隸枷鎖打掃民族牢獄的新士大夫。他們所看重的，不是百姓的覺醒，而是英主的「聖心」（梁啟超在「光緒聖德記」中說：「上乃一切獨斷，裁自聖心」），這終于使他們的維新好夢破滅于六君子的血泊中。不過從那以後，「維新」「立憲」的呼聲日益在朝野沸騰起來了。野蠻昏憤的滿清王朝，最後甚至不能不乞靈于預備立憲的騙術，企圖渡過被革命威脅的惡夢。「奔走干進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觀斷之市儈」（「墳：文化偏至論」）就利用這個時會來大唱其「金鐵國會立憲」（同上）的時調。但民族的癩瘕只是日見沈重，民衆的痛苦跟着日益加深。事勢非常清楚地指明出來了，不推翻那為中外壓迫者安排的人肉筵宴，祇是一味打算將那安排人肉筵宴的廚房粉飾一新，中國人民是絕不能擺脫被吃的悲慘命運的。

在這時候，自然有孫中山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足以衝破籠罩全國的死氣。然而，當時「束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墳：摩羅詩力說」）文化思想運動的貧乏與乾枯，恰

正反映市民層的軟弱。這是一個極苦悶的時代，魯迅的青年時期就是在這苦悶中渡過的。

受過維新黨人影響的青年魯迅，抱著「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自序」）的大希望，跑到日本去學醫，然而一到了東京，異邦人士的騷擾逼人，中華民族的風雨飄搖，祖國同胞的顛預麻木，都使他感到羞憤與惶悚。他這時的心境和抱負，恰如他在一首小詩中所寫出的：

「鑿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絮踏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

魯迅目擊中國民族陷于半死不活的狀態，無數人民被折磨得失去了民族自信力，失去了民族安全感，甚至失去了被吃的痛苦感覺，這使他異常寒心，但並不絕望。他在研究國民性的病根（見許壽裳：「懷舊」），在渴望藉助文藝來改變國民的精神。（「見吶喊。」）如果人們不依據超歷史限制的苛求來看問題，不難看出，魯迅在青年時代所提出的改造國民性，啓發國人自覺和解放個性之類的要求，正是針對着當時亞細亞式的野蠻和黑暗的，是針對民族被奴役的苦難命運的。他作爲一個愛國者，痛心於民族的受難，痛心於國民的麻木，同時又作爲一個革新思想者，憎恨僵硬的傳統制度與傳統思想，憎恨「南蟻伏墮落而惡進取」（「摩羅詩力說」）的沈重積習。顯然，在他的尚未成熟的青年時代思想中，是交流着愛國主義與啓蒙主義的要求，而這正是後來他的民族主義精神與民主主義理想統一起來結合爲一體的胚種。

第二節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爲什麼發出於國民性的

解剖與批判

魯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要求何以出發於國民性的解剖與批判？這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非常有趣的問題。機械唯物論者根本否認民族性或國民性的存在，甚至有些外行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爲只有階級性，而沒有民族性。但實際上，一個民族有它的特殊心理狀態，這是不可否認的。斯大林說：

「民族與民族的分別，不但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的不同，而且由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質上的精神容貌的差異。如果操同一語言的英吉利、北美利堅和愛爾蘭，構成三個不同的民族，那末，在這一點上，他們代代由於不同的生存條件的結果所造成的那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實在演有不少的作用。當然，心理狀態，或——像別種說法——「民族性格」，其本身對於考察家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是，它既然表現於民族所共同的文化之特質，那麼，它就是可以捉摸的，而且不能忽視的。不消說，「民族性格」並不是永久不變的一種東西，它是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它既存在于每個特定的時期，那麼，它在民族的形狀上，便印下了自己的痕跡。」（「論民族問題」，張仲實譯，九——十頁。）

如果每一個民族有牠的特殊心理狀態——特殊性格，並且這性格是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的，那末，一個思想戰士用了他的思想解剖刀來解剖中國的民族性或國民性，找出它的病根，以便改變或療救，這種工作的意義是絕對不能抹煞的。不管魯迅在青年時代對於國民性的理解與解剖，是如何包含着在時代限制之下所不能避免的缺點，但他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要解答爲什麼他要從國民性的解剖來表現他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要求，這不能單拿他個人的生活條件與教育環境來說明，而必須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特殊狀態，首先，必須說明帝國主義侵入以前的社會狀態。

如衆周知，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性一向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特點。封建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非人剝削經常在麻痺農民的勞動生產性的積極發展，破壞農村以至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使廣大勞苦民衆時常處於赤貧、飢餓與愚昧的狀態中。商業資本與利貸資本和土地所有是膠結得不可分開的。由于原始資本積蓄的條件的一般貧乏，商業資本和利貸資本未能轉化爲產業資本，農民與手工業者的勞動也就不能轉化爲產業勞動。因此，商人資本與利貸資本祇是使封建經濟制度更加僵化，更加腐化。農村生活，一半由於地主、商人與高利貸者三位一體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削，一半由於農村公社極端守舊與生產力不斷破壞的傳統狀態（不消說，這兩個原因是互相聯繫的），呈現着滯鈍、閉鎖、猥陋與萎縮的「死相」。這種「死相」因着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

壓力而更加深，而且擴大到更廣的社會生活圈子裏去。建築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與官僚制度，是封建地主的保護權力。有時在全國對立着幾個割據的王國，而這並不妨礙牠們對於封建生產方式的共同維持作用。剝削階級不僅利用經濟、政治、武力來維持其壓榨制度，同時還利用反動的精神力量（愚民政策、科舉制度、智識獨占、文化破壞等）來麻痺民衆的頭腦。被壓迫民衆本來也有他們的文化創造力量，但「士大夫常常奪取民間的東西，……這些東西一沾他們的手，也就跟着滅亡」（『花邊文學』），因此，民衆的創造力就大大遭殃。漢代以後，儒教成了地主階級的精神統治威權，南北朝以後，統治階級更利用佛教，但沒有動搖孔子在民間的偶像作用。「愚民的專制」（魯迅語）更加强了封建生產方法的頑固性與停滯性。這樣，不但被剝削被統治的勞苦大眾經常生活於淤積的死水中，連剝削者與統治者也磨去了進取的銳鋒。誠然，大規模的農民叛亂與異族入侵，可以攪動死水似的社會生活；但缺少先進階級的領導的農民叛亂，不是很快給統治者的刀鋒削平，就是給新的統治者利用去做敲門磚，根本不能變革固有的生產方式與精神生活。而異族的侵入中原，也並不改變士著的封建制度，他們祇是將這種剝削制度改裝，以建立他們自己的王朝。而且，在異族入侵後，中國的剝削階級又匍伏在「胡兒」、「韃子」的跟前效忠，借助新主子的刀鋒來鎮壓同族的被壓迫大眾。顯然，外寇與內寇的騷動都不曾引起中國社會的變質。正如魯迅慨然指出的：「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

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墳：再論雷峯塔的倒塌。」）

自從帝國主義的砲口強吻中華處子以後，古舊的封建社會制度給列強的魔手摟抱得半死半活。自然經濟生活日益崩壞下去了，但並未引起全面的生產方式突變。爲了便利掠奪，帝國主義不能不利用土著的封建殘餘與地主階級，遏阻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勃興。在社會經濟殖民地化過程中，發生了買辦資本，它祇是加深着中國民族經濟對外的隸屬關係。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微弱地生長着，但不能掙脫國際資本的枷鎖，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歷來就是以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衰病之身掙扎着，工人階級在最初半個多世紀尙未成長起來，農民殘喘於帝國主義與地主階級的重重踐踏之下。在如此的社會經濟狀態上僵臥的專制政體與官僚主義必然沉陷在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泥塘中，過去土著剝削階級對外寇甘於屈辱的傳統更加深了這種陷落的深度。專制主義與失敗主義結合，官僚主義與奴隸主義結合，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封鎖了民族進步的道路。是的，企圖衝破這種封鎖的維新運動終於起來了：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熱風：談感錄」四十八。）

然而，「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不過一夢」（同上），中國依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其後，辛亥革命撤除了滿人在中國的寢安，但「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並沒有爲共和二字所灑沒。」（「燈下漫筆。」）實際上，自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精神文明受了帝國主義的砲火洗禮，更潰溢了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膿血。這種膿血淤積在舊中國，造成了麻痺中國民族活力的亞細亞式的濃厚瘴氣：頑固而又無自信，守舊而又無特操，貧婪而又怕進取，殘暴而又怯弱，自大而又自卑，吃人而又被吃，狡詐而又愚昧，虛偽而又昏庸，吝嗇而又荒淫，怕革新而又愛破壞（寇盜式與奴才式的破壞），多夢想而又無創作，自欺欺人而又甘被欺，自命中庸而又趨極端：所有這些，本來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奇特的矛盾性格，但是這些毒質經過經濟榨取、政治壓迫、文化蒙蔽、智識獨占以及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傳染與滲透，也侵蝕一般被壓迫大眾的精神生活，敗壞民族風氣。自然，在另一方面，由於生產的落後，生活的折磨，和革命領導的薄弱，被損害被侮辱的大眾在不能找到宣洩積忿與愁苦的出路以前，爲了消極的自衛，也會發展各種病態的性格；然而造成民族劣根性的責任，無疑是應由統治者與剝削者來負的。不能否認，中國民族性不僅有它的黑暗面，也有它的光明面。但在革命勢力尚未成長到足夠衝破反動勢力以前，消極的民族性格常常顯出其可畏的壓迫力量，像潰爛的毒瘡一樣，阻礙人們前進的手腳。祇有當革命的階

級性和固有的民族性的矛盾獲得了合理的解決，民族的積極性格與進步質素才能和先進階級的實踐與意識一同飛躍地發展起來。

魯迅在早年，並未看到這種矛盾的合理解決，但他看到了傳統的民族劣根性像死屍似的沈重壓迫中國人民的精神活力，阻礙中國革新的道路，他感到無限的悲憤和驚怖。然而他深信國民精神是可以改變的，深信民族的病態是可以療救的，所以他執行了一種帶有愛國意識和民主要求的批判任務，我們可以稱之爲民族的自我批判。

第三節 魯迅所擔負的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務

從辛亥革命前夜直到五四時代，魯迅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活動，主要是表現在民族的自我批判上。在消極方面，是暴露民族的劣根性，揭發國民性的弱點，在積極方面，是喚起民族的自覺，要求改變國民精神。從表面看來，他在這一期間所攻擊的，是一般的國民性，但實質上，他的熾盛火力主要還是對準反動的統治者與剝削者。自然，他絲毫沒有放鬆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病態」（「熱風：隨感錄」三十八）的嚴厲批判。惟其因爲他憎恨民族的劣根性非常深，所以他愛護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也非常切。在他對於民族所加的鞭策中，閃爍着他的崇高深厚的民族愛。

魯迅對於民族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攻擊，是非常銳利的。在辛亥前夜，已經顯露了他在這

一方面的戰國鋒芒。滿清王朝對外戰爭與外交的失敗，並未促起統治階級的覺悟，相反地，反動統治者顯示得比以前更加昏憤，更加怯弱。專制魔王只要「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墳：摩羅詩力說」），便不惜以民命為代價，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專橫殘暴。「甯蟻伏墮落而惡進取」（同上）的阿Q主義者在外仇播歷之下「妄自尊大」，「見善而不思式」（「文化偏至論」）；自己已經做了奴隸，還要自誇為「古文明國」之華胄，「頗思歷舉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已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摩羅詩力說」）在朝在野的闊老們不願正視嚴重的民族危機，祇是一味自欺欺人，粉飾昇平。於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宰割和中國統治階級的失敗主義互為因果；被犧牲的，是中國的土地與人民。士著的統治者，對於庶民，是殘暴的主子，而對於帝國主義，則是恭順的奴才。自然，當時富國強兵的夢給了苦悶中的新官僚士大夫以若干慰安，但在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中，在滿清王朝的民族牢獄中，那裏容得了致富強之術？那些「競言武事」的「輕才小慧之徒」，根本就不懂，中國的手足給人完全捆縛住，即令武備擴張了，「而學國猶辟，授之巨兵，奚能勝任，仍有僵死而已矣。」（「文化偏至論」）那些主張立憲的紳董士大夫，根本就不了解，政權完全操在反動統治者手中，即令宣布立憲，召開國會，除了遮掩滿清王朝的潰爛而外，還有什麼意義？而況那些政客們不過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慾，不願見諸事實，將事權言諾，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

倫。」（同上。）至於那些提倡工商救國者，也忘記了整個民族經濟命脈操在外人手中，要想從國際資本的榨取中分一點餘瀝來圖富強，是多麼愚蠢可憐的幻夢！而況他們的動機，祇是出發於自私：「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為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孽，然善自退藏，或不至身受，縱大禍垂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為己，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同上。）有了這種亡國奴式的打算，民族獨立自由與否，自然全和他們痛癢無關。爲要對抗這一類「活身是圖，不郵污下」（「摩羅詩力說」）的民族失敗主義與奴隸主義，魯迅主張啓迪人民的自覺，爭取「人國」的實現：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遠，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爲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圖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文化偏至論。」）

誠然，如果不將政權從反動統治者轉移到人民手中，根本摧毀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所謂「人國」，也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就算魯迅所提出的是一個烏托邦，而在反對「愚民的專制」的思想史上，仍然有其鋒芒驚人的戰鬥意義。因爲他所理想的人國，是奴隸的「沙聚之邦」的否定，是民族獨立自由的爭得，也是人民自覺的實現。他評論拜倫的精神，說這位援助希臘獨立戰爭的詩人，「重獨立而愛自繇，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

觀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其實他所闡釋的拜倫精神，正是他當時所強調的民族主義精神，沒有獨立與自由，所謂建立「人國」根本是一句空話。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一九〇三年（魯迅二十四歲），他所寫的那篇「斯巴達之魂」（「集外集」），就是宣揚民族戰鬥精神與愛國主義的充滿熱情文藝作品。

在辛亥革命時代，魯迅參加了排滿的革命組織。但當他感到革命失敗以後，他便沈潛起來了。他自譬住在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裏面。（見「吶喊」序。）可是，一到五四的春雷響動於古老的中國以後，魯迅就以異常激烈的雄姿要打毀這間「鐵屋子」了。

五四時代，是中國民族自覺浪潮沖潰中古的反動精神生活的突變時代。這一運動是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份子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僅僅提出了反封建的啓蒙任務，他們並未深刻考慮到中國民族走向殖民地前途的危機。他們很容易滿足於局部的改革。就拿文學革命運動來說吧，雖則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提出了反對古文和創立國語文學的要求，並且實行了語文的改革，然而他們可就沒有寫出一篇表現中國民族生活的作品。無產階級的思想在五四運動初期還在萌芽狀態，但到了五四的後期，這種思潮就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尖銳地對立起來了。魯迅在當時自然還不是屬於無產階級革命行列的，他只是一個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革命家，但他的刻劃中國民族生活的劃時代的藝術，在五四時代應當被認為民族解放運動的奇異花果。這個收穫

是不能在表面上看出來的，必須發掘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才能見到。

魯迅在五卅時代的作品，充滿了反封建的思想，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然而其中是否包含了民族解放的要求呢？我的回答是，這些要求是隱藏於他的反封建思想之下。

中國民族在外來征服者和國內壓迫者合力精蠶之下，一天一天走向死滅的道路，這是使敏感的愛國者感到非常沈痛和恐怖的事。魯迅在五卅時代的戰鬥鋒鏢，是集中於攻擊國內的封建反動勢力和腐敗傳統，因為他認為這些乃是阻礙中國民族進步的主要內在原因。他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病態，表示無限的沈痛，因此用了他的銳利的筆對這些病態予以無情的揭發。他在五卅時代的反封建鬥爭，實際是他的民族自我批判工作更具體更廣大的發展。他的批判的基本武器，就是進化論。攻擊的火力主要是對準反動的國粹與精神文明，因為所謂國粹，不過是那些「現在的屠殺者」阻礙民族革新的「國渣」，而所謂精神文明，也不過是「祖傳老病」患者濫竽進步潮流的精神野蠻——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蠻人的文化」。(「熱風」)魯迅提出了一個平常的却含有深意的問題：「偷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熱風：隨感錄」：三十五。)這就給了「國粹」以鐵一般的否定。他希望中國多產生「超過祖先的新人」(「隨感錄」：四十九)，「醫治中國的昏亂病」。(「隨感錄」：三十)

八。他深切感到，民族的沉痾痼疾將使中國遭受淘汰，在亡國以後，即令保存了中國人的名目，中國人也將失去了世界：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擠出。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爲中國人！』

於是乎要從世界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去了世界，却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

——這便是我的大恐懼。』（「熱風：隨感錄」；三十六。）

要住在世界上，而又要從世界擠出，這正是一個「古文明國」的悲哀矛盾。「現在的屠殺者」是甘心要把中國民族推向絕路，而魯迅是要解除民族危機。

魯迅嚴酷攻擊了民族自大狂，因爲自大狂和自卑狂正是一脈相通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隨感錄」；四十八），正是民族自大狂和民族自卑狂互相轉化的具體說明。他以爲患了這種狂病的民族，如不設法療救，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的：「滅絕」這兩句話，只能嚇人，却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

條路的民族，便讓他們滅絕，毫不客氣。」（「隨感錄」：三十八。）

固然，魯迅還不能拿社會歷史的原因來解說民族的生滅存亡，但在這裏，他指出了一點，一個不願自求生路的民族，是只有走向滅亡的道路的。

中國民族「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華蓋集續編：死地」）的血淚史，不僅造成了政治經濟的腐潰和衰沈，並且造成了民衆生活的愚昧和萎靡，祖傳的野蠻統治制度更直接助長了這種慘狀。「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已集：題辭」），把廣大民衆自肉體至精神壓迫得成了不能伸直枝幹的「病梅」。魯迅是看穿了這種病態的民族生活的。但他並不抽象地去研究中國民族被壓迫的問題，他只是通過人性——社會關係——的具體發掘去反映民族性——民族被壓迫的現實，通過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的生動描繪去表現危殆萬分的民族命運，如以五四時代的作品爲例，「阿Q正傳」就是一篇民族被壓迫生活史的縮圖。魯迅寫出了阿Q的猥劣與麻木，但同時也寫出了阿Q被踐踏、被欺凌的慘狀。阿Q的半白癡的性格，是不能依照「理水」中「拿拄杖的學者」所主張的「國人的子孫都是國人，愚人的子孫都是愚人」那樣的遺傳學來解說的，這種性格明明反映了赤赤裸裸的社會關係，並且也是這種社會關係必然造成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用說不是一個半白癡的流浪佃農所能發明的。實際的情形却是，爲了在不斷被踐踏、被侮辱的生活環境中維持自己可憐的生存，他不得不從他的主子們那裏接受自欺欺

人安於奴隸命運的精神傳統，來麻痺受傷的靈魂。自然，他並非接受這傳統的「第一個」，和他同一命運的被損害者早就如此做了。如其阿Q沒有自輕自賤的卑微感和自毀自解的優勝感交錯運用，他能在土穀祠裏「心滿意足的躺下」，「得意了許多年」（「阿Q正傳」）嗎？阿Q和他同命運的人羣所應用的精神勝利法，明明是有本本的。難道哼着「中國地大物博，開花最早，道德天下第一」（「熱風」）得意文章的國粹主義者，不是高等阿Q主義者嗎？難道高唱「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熱風」）濫調的民族誇大狂，不同時又是自稱蟲豸的民族自卑狂嗎？在先前，是北方的異族用快馬和屠刀闖入了中原，在後來，是帝國主義用槍砲和商品轟毀了中國守舊的萬里長城，「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清人，都如入無人之境。」（「華蓋集：忽然想到。」）在這些災害中，土著寄生階級，連同自己生息其中的民族，分明遭到了被掠奪、被踐踏的命運，然而他們不敢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却是「用庸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論睜了眼看。」）明明是慘敗了，給人做了俘虜了，但却不願承認失敗，也不願從慘敗的歷史中去學習教訓，爭取勝利的前途。這性格通過政治的和社會的精神的壓迫權力，也就傳染到了廣大被壓迫的羣衆。（自然，我並非說，阿Q主義的產生只能單純歸因於異族和帝國主義的闖入，阿Q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有着比這更複雜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由於中國民族長期被征服被壓迫的史實，阿Q主義取得了易於孳生繁殖的條件。）除非把阿

Q主義放大，和民族被踐踏的血史一同考察，人們是不會認識阿Q主義的根源的。魯迅不但有意識地通過阿Q的劣根性，暴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同時也不自覺地通過阿Q被摧殘被奚落的生活史，烘托了中國民族被損害被侮辱的血淚史。因此他在「阿Q正傳」寫出：「阿Q……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在另一處他又指出：「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偽自由書」）在他後來的許多作品中，常是對照著土著壓迫者的麻木，寫出了異族（包括古代的異種族和現代的帝國主義）征服中國民族和奴役中國人民的慘史。如果魯迅否定了阿Q的劣根性，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弱點，當然也就連帶否定了那應由土著寄生者負責的「國民的弱點」，否定了一切革命的不徹底性。不洗去這樣的弱點和不徹底性，加強中國民族抵禦外來橫遭的精神武裝，中國是絕不會由牛馬奴隸之國變為真正的「人國」（「摩羅詩力說」），而中國人民也就決不能「創造中國歷史上未嘗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墳」：燈下漫筆。）因此在他嘲笑精神勝利的反面，他教我們怎樣在民族新生運動中鍛鍊鋒銳的勝利精神，這種勝利精神，唯有在清算失敗主義的鬥爭中才能生根的，因為失敗主義正是阿Q主義的本質。

第四節 魯迅的反帝思想的發端

如果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和五四時代，是從側面來表現和警告中國民族被征服被壓迫的現實，是着重於國民弱點和民族病態的暴露，那末，到了五四以後，也就是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期間，他就開始從正面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着重於民族生存戰鬥精神的發揚。自然，他同時也不放棄民族遭受壓迫的側面揭發。這一發展恰正是反映帝國主義對中國掠奪重新加緊，也反映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重新高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歐戰時期一度繁榮的風光，只消國際資本捲土重來的洪水一沖，就給湮沒下去了。帝國主義權益和中國民族生存的尖銳衝突，激起了中國民衆的革命新潮，這新潮是爲國際帝國主義所不能容許的，他們用了一切橫暴卑劣的舉動和陰謀來對抗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封建地主和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軍閥官僚，極馴服地執行了國際主子屠殺人民鎮壓革命的意旨。民族資產階級消失了五四時代一點僅存的銳氣，重新走上了失敗主義的舊路，他們曾經對軍閥和帝國主義抱了過高的幻想，希望經過妥協來苟延殘喘，在政治上取得一角立足之地。然而無情的事實很快就教訓了他們，證明了他們的幻想已經破滅了。經過廣大羣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浪潮的推動，一個新的民族革命戰線（包括工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建立起來了。中國民族第一次以洪大的聲音向全世界怒吼了。這一切情景，魯迅是用着戰慄的和興奮的心情來看的，他經過徬徨和孤獨的苦悶，畢竟重振了昂奮和熱烈的戰鬥精神。

亡國士大夫歷來是用「排斥異端的正氣」（「阿Q正傳」）來擁抱「國粹」的，就是號稱維新的新官紳也不過是想「用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闢上大門，再來守舊。」（熱風。）他們不僅是封建殘餘勢力的保鏢，其實同時又是殖民地的敗卒。正因為他們失去了民族自衛的信心和勇氣，所以他們懼怕外來的新事物，而只有藏在「國粹」的烏龜殼內，正像契科夫描寫的貝里柯夫縮頭在囊中一樣。五四雷雨曾經動搖了守舊的精神體系，然而隨着民族資產階級的退嬰（約從一九二〇年到五卅以前），「反改革的空氣又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華蓋集：通訊。」）這種反動空氣的氾濫，不僅反映着中國封建守舊勢力向革新勢力的反攻，而且特別反映中國民族殖民地化危機的加深，反映革命民衆（首先是工人階級）和守舊勢力鬭爭的進展。一方面是革命化的民衆把五四時代的文化革命成果加以發展，另一方面是封建營壘和妥協的市民層在文化思想上大開倒車。魯迅對後一種反動傾向作了比五四時代更尖銳的打擊。成爲這一時期的特色的是，他意識地明確地把反守舊勢力的鬭爭和民族危機的解剖聯結起來。他指出了，那些復古的守舊的反動份子，雖然死死抱住「國粹」不放，自命爲民族「固有文化」的守護者，然而實際上，他們是喪失了民族自信力的，是一面站在前門畏懼外來征服者，而又一面打從後門引進帝國主義的。他確信着，一個民族愈是頑固地排斥異端，就愈證明其衰弱；反之，越是魄力雄大的民族，越有勇氣取用外來事

物。他曾引史實來諷喻國人：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薰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爲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無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的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竟成爲辱王和辱奴的寶貝。」（「墳」：看鏡有感。）

反革新勢力把一切革新勢力當作「赤化」危險來「討伐」，「國粹」遂成爲軍閥及其走狗的「寶貝」，帝國主義更從旁張大國粹派的反動氣燄。就在這時，魯迅通過了繼續反封建反國粹的戰鬥來喚起民族的覺醒，來攻擊帝國主義鷹犬削弱民族解放力量的活動與陰謀。國故論者「口口聲聲叫着保古，保古，保古」（「華蓋集」），然而他們根本忘記了帝國主義者正利用中國統治者「不肯變革……自相殘殺」（同上）的機會「很容易地進來了」。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還是保存「國粹」來犧牲中國呢，還是犧牲國粹來保存中國？魯迅指出了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現在，「古也就難保，因爲土地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無處陳列。」（「華蓋集」：忽然想到。）他最痛恨的是，守舊的反動統治者對國內民衆

則作威作福，而對帝國主義則奴顏婢膝，所謂「見了羊顯兇獸相，見了兇獸則顯羊相」（「華蓋集」），正是這些奴才們最逼真的寫照：

「復古家儘可不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華蓋集：燈下漫筆。」）

中國反動統治者就是這樣打着「肅靜」，「迴避」的朱牌，來爲外來的征服者清道。不但如此，他們還繼承了歷來事大主義的奴隸傳統，很恭順地爲外來征服者安排人肉筵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就是辦酒的好材料。」（「燈下漫筆。」）

「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懸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會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醞，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專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擄，然而必得贖價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醞呢」（同上。）

以前被「天朝」目爲蠻夷強迫下跪的西洋帝國主義者（後來還有東洋帝國主義者），駕着他的砲車來到中國，做了「享用盛醞」的上賓，他們壓根兒就不把中國人當人算帳。雖然有時也「頌讚中國固有文明」（同上），但那不過是「醉飽後的嘔吐。」（霍普斯泰因。）實際上，他們

有權利在中國隨意宰殺人民，「以膏饒吻」；五卅慘案就是一個例子。當帝國主義的屠刀在上海閃着兇光造成了極大的流血慘案的時候，一些高等華人在那裏極力「辯駁」，洗刷「赤化」的「罪名」，魯迅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義憤：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却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爲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會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却並不被稱爲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駁，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華蓋集：忽然想到。」）

帝國主義的「文明」本來就是建築在壓迫殖民地（包括半殖民地）的暴力上，因爲「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用暴力將殖民地強制在「統一的整體」的範圍內，是不能够生存的，……不然，它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了。」（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雖然中國尚未變成被帝國主義獨占的或瓜分的殖民地，但帝國主義剝削中國民族，以暴力強制中國成爲他們的經濟政治上的附庸，這一事實已經存在很久了。魯迅揭穿了帝國主義的「文明」的本質，指出「文明向來是如此的，並非到現在纔將假面具揭下來。只因爲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

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却了。」（「忽然想到」之十。）難道中國人民忘了鴉片戰爭時代不列顛帝國的砲轟嗎？忘了太平天國時代戈登、華爾的洋槍隊嗎？忘了甲午戰爭的流血嗎？忘了中、法戰爭時法國人在諒山的屠戮嗎？忘了八國聯軍在華北的燒殺淫掠嗎？中國人民如不健忘，就應該清醒地認識，帝國主義在上海、沙基、漢口等地製造的流血慘劇，本來不過是過去屠殺政策的繼續。在這樣的慘酷局面之下，高等華人們還要「皇皇然辯經」，「張着含冤的眼睛」和帝國主義講「公道」，那除了傷害中國民族的自尊心，增大帝國主義的橫逆氣焰而外，還有別的結果嗎？魯迅教給了我們對抗暴力的戰鬥道路！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

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支虛經緯平穩圓滑上去，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上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驗的時候。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過疑，只是試驗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奉

蕭集：忽然想到。」

魯迅認識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長期性，他勸告中國青年「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中國青年的確沒有辜負這位民族先驅者的期望。從那以後，三十年的奮鬥道路我們至少已經走了一半了。我們堅決相信，只要全國人民絕不動搖地「抗拒，改革，奮鬥」下去，是一定可以縮短爭得民族徹底解放的途程。在不到三十年的苦鬥中，完成我們的革命大業的。

然而，在「抗拒，改革，奮鬥」的過程中，各種重大困難向民族革命戰線襲來，是絕非意外的。帝國主義不僅要常常親自出馬來壓迫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更毒辣的是，唆使黃面皮的鷹犬來摧殘反帝民衆，以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一九二六年北京愛國青年用請願來抗議日本和列強干涉中國革命，立即遭到帝國主義的華種獵犬的毒手，暗無天日的三一八慘案就是如此製造出來的。魯迅的筆噴出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憤火：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飄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屠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能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鑛洞的鑛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這是鐵一般的真理。事實上，除了熱血的愛國者而外，那些「心悅誠服地充當奴才沒齒而無怨言」（「華蓋集續編：死地」）的賤胚子是唯恐中國不亡，那些「見了羊顯兇獸相，而見了鬼獸顯羊相」的「奴隸總管」是只有加速中國的滅亡，而那些「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華蓋集」）的驕頭們唯有坐待中國的滅亡。魯迅是愛護愛國者（民族解放鬥爭者）的，因為他們是中國民族僅有的生氣和活力。然而，在另外一方面，從帝國主義直接和間接豎起的殖民地奴才那裏，却常常噴來了醜惡愛國者的狗血。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就經常在為帝國主義及其奴僕洗刷「侵食中國」和「殘虐百姓」的罪名，魯迅帶着正義的憤怒跟他們搏擊，因為他們乃是「比主人更惡厲的狗」，並且常常又是「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哈吧狗。」（「墳：論費厄澗賴應該緩行。」）看一看章士釗、陳西澧們的嘴臉吧，他們說，五一八慘案「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說青年男女「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

踏死傷的苦」，是只怪他們自己幼稚，魯迅寫道：「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華蓋集續編：空談。」）再看一看「詩哲」徐志摩的敦睦邦交的怪論罷，他說：「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羅曼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魯迅寫道：「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爲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寒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魯迅用投槍猛擲帝國主義的鷹犬奴僕，正是要堅定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民衆的確信，正是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永遠這樣的幹下去。」（「華蓋集：忽然想到。」）

在號召反帝國主義戰鬥的時候，從來不是作爲一個單純的愛國主義者，一攻擊了「侵食中國的虎狼」，就放鬆了幫忙虎狼的佞鬼，相反的，他絲毫不爲對外的鬭爭或亂了反對國內黑暗勢力的目標。他常常把內賊和外敵放在一道來拷問，來打擊，甚至攻擊帝國主義的鷹犬奴僕比攻擊他們的主子更嚴酷無情。這就是爲什麼他在帝國主義加緊屠掠政策時，毫不放鬆和奴才胚子的官僚政客與「正人君子」鬭爭，爲什麼他一面沈痛地鼓勵愛國者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另一面清醒地警告大眾不要安於「做自己人的奴隸」（「半夏小集」）；這是貫串在他的

全部民族主義思想中的一個最大特色。這裏再舉一個實例來說明：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面目暴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就不足為奇呢？」（『華蓋集』，忽然想到。）

只要是對民衆的殘虐和迫害，不管他是『舶來品』，還是『國貨』，魯迅毫不遲疑地起來攻擊它。魯迅自始就不是一個沙文主義者（Chauvinist），而是一個民主的愛國主義者。

第五節 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

如果說，魯迅在五卅時代主要是通過民族的自我批判來喚起民族自覺，在大革命時代主要是作為一個民主主義的愛國者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奴狗，那末，到了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是作為一個階級論者把民族主義自覺地和國際主義聯結起來。研究這個蛻變，不僅對於魯迅思想的了解有極大價值，而且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有深鉅意義。

大革命暴風雨曾是使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奴才震駭絕叫的一個噩夢，魯迅當時曾以抑止不住的興奮心情歌頌這暴風雨。然而，帝國主義暗中的『帶甲拳頭』很快就得到了土著的殖民地奴才的

幫助，擊破了中國的革命戰線。資產階級再度退回了民族失敗主義的舊路。這樣開始了新的民族大分裂，同時也開始了革命戰線內部的大分化。殘酷的階級內戰和嚴重的民族危機一同發展，這特點也深刻地反映在文化思想戰場上。在革命戰線方面，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非常明朗地結合起來了，舊式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遭到了實際的和理論的清算。歷史以空前的明確性指示了只有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動力，因為大革命失敗後，它在與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基礎上，堅強地英勇地單獨領導革命。這是中國革命運動相對地沈潛的時候，然而也是革命運動較前更為深入的時候。魯迅的明確採取階級論立場，加入新的集體主義戰線，從整個革命運動發展趨勢來說，正有其歷史的必然。

不過，我們不能以這種一般的說明為滿足，問題是要更進一步找出魯迅思想發展的內在原因。

如衆周知，魯迅原來是採取進化論觀點的。他曾用生物的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說：「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這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就從這個命題出發，他得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六」）的主張。因為他深信「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所以推論出來，就以爲子代必比父代進步，幼者必比長者重要，而青年人也

必比老年人優勝。把這一系列論點擴大開去，他就認定將來必比現在光明，而革新勢力應當代替陳舊勢力。他深知舊傳統對於人類進化的阻力巨大可怕，但他堅信「生命的路是進步的……什麼都阻他不得。」（「熱風：生命的路。」）L. Le Bon 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之力大，誠然也有理由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着。（「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這種進化論的觀點貫串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非常鮮明觸目的。

本來，從進化論出發，人們可以走上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利用進化論作為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護符，他們把生存競爭、自然淘汰和適者生存等進化論的範疇，來論證資本主義的競爭與掠奪是合理的，強者犧牲弱者是必要的，而少數財富占有者和帝國主義永遠支配世界是適合自然法則的。這種反動的理論，歷來就被某些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者所傳播，所援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強調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概念——發展概念，來論證人類社會和人生是不斷在棄舊更新的，將來必勝於現在，正如現在必勝於過去。這樣的觀點自然還是不完全正確的，它還脫不了用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來概括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這個軌轍，但它顯然和前面一種觀點有根本差別。因為不可否認，雖然人類社會和生物界各有自己的發展法則，而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運動與發展，却是統一於唯物辯證法之下的。因此，這樣的發展觀雖然仍舊不可與辯證法的發展觀混為一談，但和後者有相當親近的血緣。魯迅先前正是持這種觀點來運用進化論

的。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包含了許多關於歷史發展的觀念。他否認國民性與人性是不變的，堅信人類與人道是不斷在生長的，生命是向前進步而「不回頭」的，事物「沒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黑暗決不能永久存在，「凡活的而且在生長着，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這裏不能多引原文，請參看拙作「魯迅的思想遺產。」）這些信念幫助他擺脫了失望悲觀的暗影，而走向了積極戰鬥的道路。他不是一個庸俗的客觀主義者或靜觀的進化論者。和他的進化論發展觀一同，有着最鮮明的變革精神浸透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就是，積極方面歌頌革新，強調改變，主張超越（後代超越前代，將來超越現在）號召反抗，消極方面反對因襲，攻擊腐舊，憎惡傳統（陳腐的傳統），詛咒復古（以上加有黑點的字眼都引自「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書，原文不必多引了）。顯然，他的進化論世界觀和他的戰鬥現實主義相結合，包含了個別的辯證法種子，這種結合就作了他日後躍向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跳板。

而且由於魯迅把進化論和戰鬥現實主義聯結起來，又使他早期的思想包含了唯物論的成分。誠然，他在青年時代的思想頗帶有唯物論的色彩，所謂「掃物質而張靈明」（「文化偏至論」）「崇奉主觀，張皇意力」（同上）之類的觀念，就是受了斯蒂納（M. Stirner）叔本華、尼采諸人的影響而揭發的。他用這種唯心論的武器來提倡個性解放，攻擊立憲主義者，客觀上自有其反專制的戰鬥意義。然而當革命運動發展到需要徹底清算封建勢力的時候，這種武器就不適用了。

因此，魯迅在五卅時代大體上是採取了唯物論的觀點，不過這時的唯物論還是基於直感性的認識來運用的。它主要表现在反對精神文明，反對精神勝利法（廣義的），提倡科學思想，攻擊所謂「特別國情」等論著上。和反對精神文明相聯的是，他提出了「生存，溫飽，發展」的有名命題，把這一命題加以闡釋，顯然就是主張增強，改變和發展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物質文明，克服中國的守舊勢力與落後狀態。他說：「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因此他的民族主義和精神文明、國粹主義、特別國情說是絕對不相容的。他對於個人與環境之關係的了解，大體上也是站在唯物論立場的。例如論到「時代落伍者」時，他發表過很深刻的見解：

「時代的環境全部遷流，並且進步，而個人始終如故，毫無長進，這才謂之「落伍者」。倘若對於時代環境，懷着不滿，要牠更好，待較好時，又要牠更加好，即不當有「落伍者」之稱。因為世界上改革者的動機，大抵就是這對於時代環境的不滿的緣故。」（「兩地書」第一集。）

每個人只要對於時代環境有清醒的認識，隨着時代的進步而前進，就會「有不平而不悲觀」（同上書），自然就成爲時代的戰士；而且只有如此，環境才能因人力而改善。在這裏，人的實踐對於歷史的發展取得了主動的地位。

正因為對於時代環境與人的實踐作了清楚的估計，所以魯迅到處強調了改變環境的必要和可

能：

「什麼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熱風：生命的路。」）

魯迅重視主觀的能動作用，是從對於客觀世界的清醒認識出發的，如果客觀世界沒有泥土，自然踐踏不出開闢不出「路」來。但僅僅有客觀物質條件存在，有人的能動作用，還是不夠的，這中間還必須要有其滋養實踐的物質力量。因此，魯迅主張在抗拒改革，奮鬥時，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認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兩地書」）。他反對阿Q式的「白盔白甲」式的幻想，主張「深沉的韌性戰鬥」（「墳：娜拉走了後怎樣」），正是說明他的現實主義是與唯物論的戰鬥觀結合為一的。在魯迅的早年創作中，對於典型性格與典型環境的關係的處理，常常暗示出一個真理，即人的本性是受一定的生活環境的規定的。如果他把阿Q的性格和封建社會的剝削、壓迫、勢利與愚昧切離開來，把阿Q描寫成爲一個簡單可笑的傻瓜，「阿Q正傳」是決不能成爲一篇劃時代的傑作的。一個有正義感的讀者對於阿Q不知不覺流露單純的同情，那決不是因爲有所愛於他的性格，而是由於憎恨那摧殘阿Q的黑暗世態，很自然會替阿Q分受人間的痛苦。從「祝福」那篇小說中，人們會讀得出，宗法社會的禮教是怎樣殘酷地吞噬一個可憐的婦女，殘害她的脆弱靈魂。從「孤獨者」那篇小說中，讀者會看得出，一個孤獨的智識份子，如

何在世態炎涼的猥劣社會環境中，改變本來面目，「躬行先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所崇拜，所主張的一切」，開始在「失敗」中來撈取「勝利」，終於在「勝利」中忘記了「失敗」。魯迅寫人物時，他的筆總是像山鷹的巨爪，緊緊抓住在一定生活環境中鑄成的某種性格之特點，因此寫孔乙己，決不同於阿Q（雖然孔乙己也帶有阿Q性），寫魏連受，決不同於涓生，寫愛姑，決不同於祥林嫂，寫高老夫子，決不同於四銘。環境與性格的多樣性與可變性，在他的小說中，是用着最生動最鋒銳的筆觸雕刻出來的，即使在他的粗線條的速寫中也是如此。從他的對於環境與性格的關係的處理中，人們會看出他是運用高度的寫實主義手法的，而這種手法的背後，分明隱藏了他的直感性的唯物論世界觀。

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在魯迅運用起來，有着一定限度的進步意義；在反封建傳統的圖爭中，是可以發揮武器的作用的。然而，當革命戰鬥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當尖銳的階級矛盾與民族危機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全面來重新估定一切、檢討一切的時候，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顯然就會暴露它們的弱點。魯迅就從自己的實感與實踐中經驗到原先的武器碰到了不能解決的矛盾。他的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由直感性的唯物論跨向歷史的唯物論，由個性主義跨向集體主義，由人道主義跨向社會主義，與其說最初是受了學說的誘導，不如說是出發於深邃的生活實感與現實觀察。（這一點巴人已先我指出，不過原文找不到，加有旁點的句子，意思上和巴人的說法相差

不遠。)他在廣東「目視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兩大陣營」之後，他的「思路因此轟毀」了。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譯案：許多人根據這兩句話來概括魯迅的進化論思想，顯然是用例證代替了他早期的全部世界觀。實際，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在內容上比這兩句話廣大的多)，……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三開集」序言。)他目視了無產階級在大革命中與革命失敗後浴血抗戰的精神，看到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革命勝利與建設成功，內心非常感動，因此極誠懇地解剖自己說：「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一個在真理面前「俯首甘為孺子牛」(「集外集」)的現實主義戰士，是最善於根據「事實的教訓」向前馳驅的。魯迅之所以能够把握世界最高的革命真理，主要是由於他清醒地認識現實，用「事實的教訓」來武裝自己。自然，這並非說理論的學習對於他的思想發展不重要，他自己就說過：「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讀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開集」序言)。

魯迅在思想上發展成爲一個階級論者，雖然可說是一個飛躍，但這飛躍是經過他自己的思想準備和自我鬥爭實現的。因爲他所走的，一向就是現實主義的路，所以無論是對於事情的觀察，人物的解剖，問題的提出，他都是由觀察和發掘客觀的真實出發的，這就使他的思想不自覺地包含許多唯物辯證法的個別因素，使他能够深刻地把握住客觀世界的現實生活關係，使他傾向於「變革世界」這個最高命令。但是，由於他的前期思想受到進化論的限制，他主要是根據直感經驗和正義感去體察世界，批判現實，因此，他雖是「覺到了舊社會的腐敗」，「希望着新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這就使他當時不免「常常以「不勝遼遠」似的眼光對無產階級。」（晝空：「革命與知識階級。」）十月革命的巨大勝利使他開始認識了無產階級的力量，然而「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使他「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同上。）直到後來「蘇聯的存在和成功」給予他以深刻的印象，他在那「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陣，變革，戰陣，建設，戰陣，成功」（「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這纔使他「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答國際文學社問。」）顯然，他的現實主義精神幫助他走向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終於打破了過去拘束他的進化論的限制，衝決了直感唯物論的不徹底性，而這種

轉變是經過他的誠實的嚴刻的自我鬥爭完成的。他在翻譯科學的文藝論時，就自白：「打着我所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却決不肯有所增減」（「二心集」），可以充分表現他是如何不留情地跟自己過去的「偏頗」搏擊。

在沒有意識地接受唯物史觀與階級論之前，魯迅通過直感的體驗，是看到了階級的對立，有時不自覺地接觸到了社會存在決定主觀意識這個最高命題的。在他早期的雜文中，他是在不斷地和所謂「閹人」、「治者」、「壓迫者」、「屠殺者」、「正人君子」、「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鬭爭的。他會很巧妙地暴露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關係，指出了剝削者與支配者無法穩定其統治的悲哀：

「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之徒，却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墳」：春末閒談。）

在這裏。不但揭發了階級相互間的矛盾，而且暴露了剝削階級所要維持的社會秩序的內在矛盾，割出了支配階級內心的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裏不僅寫出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還指

出了資本家爲什麼一面要殘酷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一面又要維持工人及其家屬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同樣，他和恩格斯也分析了奴主與奴隸、封建主與農奴的對立，暴露了歷來的剝削階級依靠被剝削階級所遭遇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在尚未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前，魯迅固然不能從本質上解釋社會的階級矛盾關係，但是他實感到了並且描寫出了這種矛盾關係。更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常是把階級對立形象表現在他的文藝作品中。在「阿Q正傳」中，一面存在着阿Q、王鶴、小D、吳媽這一羣被踐踏的人物，一面活躍着趙太爺、秀才、趙司晨、假洋鬼子這些踐踏別人的國人（這當然是大體上的劃分，從階級成分來說，阿Q是屬於雇農）；最後在辛亥革命的場而中，豪紳地主竟然成了「革命政權」的掌握者，而幻想「白雲白甲的革命黨造反」的阿Q終不免落入流血的「大團圓」中。這就刻劃了辛亥革命的流產。在「故鄉」中，不僅寫出了「閻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刻劃了他被生活壓迫失去了活氣，而且描繪了在閻土和作者間之無形中隔着一道深淵，這深淵把他們幼小時的天真友情淹沒掉了：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閻土說。

「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閻土說着，又叫水

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吶喊」：故鄉。」）

自然，魯迅早年的階級體認，主要是依據生活的直感和歷史的經驗得到的，所以並非浮光掠影的，但因為缺少有系統的階級理論的幫助，他究竟不能以科學的歷史觀去分析各個社會形態的階級關係，使他大體上不能超過進化論的局限。他曾說過，在早年讀俄國文藝時，「從文學裏明白了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這個劃分，誠如他自己所說：「從現在看來，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却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同上。）然而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僅僅認識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還是不夠的，問題是在於要進一步把握，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什麼樣的壓迫階級和什麼樣的被壓迫階級對立，並且怎樣對立。在一九二七年，他曾在演講中特別強調「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正是突破庸俗的超然文章觀的卓越理論。然而他在當時究竟還不是依憑階級關係的分析去研究文藝史，所以不能更本質地解決文藝的歷史發展諸問題。認識上的局限和真理的追求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這使他不能繼續停留在進化論的階段，而不能不迫切尋求新的「思路」。他終於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代替了多年的進化論。經過了這個巨大的蛻變，他在最後七八年間思想活動的戰果，幾

乎可以說超過了他過去二十年的思想勞績。現在很有些人好意地否認魯迅在一九二八年後的思想突變，以爲承認這種突變，就否定了魯迅思想的一貫性，我以為是沒有了解真理的發展規律，同樣也沒有了解魯迅。在個人思想史上，有什麼比跨過一座思想高山這件事更艱難更光輝的呢？魯迅自己是沒有否認他的思想突變的。他很早就說過：「多有不自滿的人，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熱風」），他就是一個不自滿而永遠前進的思想戰士，他不但頑強地跟周圍的黑暗主力搏戰，而且堅定地和他自己的過去鬪爭，這恰是他的平凡中的偉大。正因為他能够有勇氣有識力改變自己的「思路」，才能顯示出他的思想的一貫性（現實主義的本質）的發展，也才能顯示他的思想戰鬥的光芒；而歷史就在他身上指證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優越，預示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勝利。

魯迅的了解一切問題，始終顯示了一貫的特點，就是依靠直感與經驗，深入具體的事物及其相互關係，掘出他們的矛盾。他早年從經驗與直感中熟識了各階級的生活相與矛盾性，意識到了壓迫者（治人者）和壓迫者（治於人）是永遠不能相通的，是在矛盾與敵對中聯繫的（「春末閒談」提供了輝煌的範例）。所以在他自覺地用階級論來代替進化論之後，他對於階級鬥爭、階級性與階級關係的理解與闡釋，比許多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人深刻得多，也切實得多。

魯迅的闡釋階級論，正如他的解剖別的事物一樣，不是出以抽象的說教，而是用綿密的思力

與實踐去探掘現實矛盾的泉源。正像傳說中的由大禹在夜裏化成的黃龍，是親自用他的堅嘴與利爪，去疏九河的。（不會有人以為我是在拿魯迅比做大禹吧。）他在二九二八年已經堅定地宣稱文學、性格、感情等「都帶着階級性」，因此「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關於階級性的解說，在他的雜文中提供了浮腫似的範例。他把階級性表現得如此明確和生動，使人好像從銀幕上看到了各個階級所扮演的角色的容貌，的性格，的搏擊。下面就是兩則關於人性與階級性的關係之科學的藝術的解說：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麼？」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着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給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而已集」：文學和出汗。）

「梁先生以爲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爲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個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爲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爲「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够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道力和虔敬，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卻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毋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饑饉的災民，大約總不會去種蘭花，像國人的老太爺一樣，買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甯呀！」固然並不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的東西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爲至高，則表現最普遍

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表現人性爲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爲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從上面兩則標本中，我們讀到了光芒四射的階級論的闡發。作者向我們提出了如下的真理：抽象的超階級的不變人性在現實社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離開了具體的階級關係的把握，無視了人世間的階級性，就決不能說明和表現人性。由於社會生活——階級關係在不斷遷流，人性也是借階級性來表現自身的改變的，所以現代的人性決不同於古代的人性。同時由於階級關係決定人性，各個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生活形態，所以無產階級的觀念、趣味、習性和情緒也決不同於資產階級。在階級社會裏，階級性是必然表現在一切生活領域和意識領域中的；如果剝削階級有它自己的文化，那末，被剝削階級爲了生存與戰鬥，也就必須有自己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學就是其中之一種。在這裏，魯迅不僅直接粉碎了「文學當描寫永久不變的人性」（「文學和出汗」），「文學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文學理論，實際上也間接打破了一切反動集團超階級的謬論。在這裏，魯迅列舉了許多生動鮮明的實例來幫助真理的闡明。然而你決不會以爲他是用例證來湊合理論，相反的，他是從活生生的理論與實際的溶合中，來發掘和燭照真理。他所舉的例證不是裝飾客廳的瓶花，而是天然開在枝頭的

花朵。

魯迅不僅看穿了社會的階級敵對的實質，而且用電光似的炯眼洞察了在現社會中各個階級的沒落與上昇，用火炬似的筆力照耀了無產階級的戰鬥雄姿和勝利希望。他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纔有將來」，因此把他過去寄托在青年身上的光明希望和偉大熱愛，更集中地更具體地寄托在無產階級身上。（自然，他到死也沒有減弱對於青年的希望與熱愛。）他絲毫不諱言自己是獻身於無產階級的戰士；在他加入了新興人羣的戰線之後，他更像崇山般地屹立在政治的文化的戰場上，公開表示自己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聯繫，揮動他的雙峯似的巨臂，和一切階級敵人作不倦的搏鬥。當「喪家的資產階級的乏走狗」（「二心集」）在那裏對無產階級狂吠，否認後者的自覺的時候，他挺身出來提出抗辯，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把敵手所主張「無產階級本來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有同情心而又態度偏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理論搗得稀爛：

「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

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爲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中國無產階級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間，遭受了人世間最殘酷最惡毒的迫害和摧殘，然而他們一面在用血寫出自己的失敗史，也另一面在用血寫出自己的勝利史。這樣的勝利雖則是局部的，個別的，無產階級戰士總是以含淚的喜悅珍視它們，發揚它們。作爲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領袖的魯迅，在柔石等七位文化戰士流血以後，用那爲了無產階級文學而寫的悲壯的頌詩，代替了那爲死難烈士而唱的哀傷的輓歌：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壓迫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先驅的血。）

戰士的流血並未使他因感傷而頹唐，相反的，他在戰場上站得更穩。他的心搏和大衆的心搏交響成爲一片。人們分辨不出：是他以大衆的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還是大衆以他的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不管階級敵人的刀斧是如何兇殘，但他毫不動搖地指出：「無產階級文學却仍然滋長，因爲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大衆群衆的。大衆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文學也就滋長一日。」（同上。）他的預言已經由歷史的事實證明，將來還要由更光輝的歷史事實來證

明。

實際上，無產階級和無產文學不備受暴力的摧殘，也遭到那些被蹂躪的走狗文人的圍剿。

「民族主義文學家」就曾盡了這種獵狗的任務，他們用邊謊、誣蔑、和一切卑劣伎倆向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文學進攻。魯迅對他們作了最兇猛的回擊。他宣布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不過是「龐大派」文學，揭穿反動階級的文人向來以「自欺欺人的種種美名來掩飾自己的潰敗，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在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作一回最後掙扎了。」（「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他用畫筆描出了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批判了它的沒落的命運，也畫出了甘為帝國主義龐大的反動階級的鬼臉，判定了他們的最後歸宿：

「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纔能脫出墮沉滯、猥劣和腐爛的命運。」（同上。）

中國階級鬥爭的尖銳發展，不僅使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在惶恐的絕叫中，動員了全副武裝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加緊對工農的圍剿，同時也使一部分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大體上說來，小

資產階級在當時與工農建立了革命聯盟，預感到了自己沒落命運，怕見工農革命運動的勝利，而投身到資產階級地主的陣營。他們和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披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對進步勢力大放冷箭。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思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在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土匪說的論客」（『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就是指這批人而言。他們之中一部分人以「第三種人」的面目出現，自命為超然於階級鬥爭與政治敵對之外的理論家與作家，但其實他們分明是在反革命的刀光劍影中襲擊革命，因為他們「不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墳：雜憶』），不向壓迫者爭求自由，而反向被壓迫者要求自由。爲了保衛革命文學和整個革命戰線，魯迅揭去了這些虛偽的自由主義者的「超然」面具。他揮動階級的武器，指出：「雖是『第三種人』，却還是不能超脫階級的，……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論第三種人』），指出那些「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國的時代而要離開戰國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同上）的人們，其幻想「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可笑。

魯迅的徹底的階級論，一點不掩藏地和政治戰鬥取得了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正是他過去反對「超於政治」的文學的歷史現實主義的深廣發展。他確信，一切應服從於最高的階級革命任務，而這任務，在現在祇有通過政治鬥爭表現出來。凡是把階級關係和政治鬥爭切離開來的有害

傾向，在他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然而僅僅承認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還是不夠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時也能够拿了這種虛偽的承認來掩飾其「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一個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必須堅信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最高領導權，堅信無產階級靠了階級專政能够最後消滅階級敵對，建立無階級的社會。魯迅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戰士。當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在那裏譁譙蘇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怕結果」來恐嚇「智識階級」的時候，他立刻提出反問：「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爲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去謀害牠，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當幼稚病者在那裏用恐嚇代替正當的革命戰術，來打擊論敵的時候，他立刻作了糾正：「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南腔北調集」：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他無畏地宣布自己願爲無產階級的勝利貢獻一切，因爲他「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魯迅的堅決皈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正是他過去一貫反對社會黑暗和政治野蠻的戰鬥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曾坦然地承認：「我的反抗，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不過，他早年在反對黑暗的戰鬥中，最引爲苦悶的，是那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戰伴動搖變節，而一時又不能找到「新的戰友在那裏」。（「自選集」：自序。）同時在思想上，他也常常感到，社會如不徹底

改變，任何局部的改良主義和溫情的人道主義，都不能根本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他曾說過：「人道不是靠佈施捐助得到的，是要用奮鬥培養出來的。」（「熱風」。）一九二三年他曾經贊成婦女要爭得經濟權，但他接着又指出：「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是廢話。」（填：娜拉走後怎樣？）值得注意的是，他這時已受了唯物史觀與階級論的初步影響，或者不自覺地吐露了新社會觀的萌芽。爲了要尋找「新社會的職友」，爲了要追求澈底變革社會的方案，他的跨過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而走向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過，這種轉變還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我們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如衆周知，魯迅在最初是傾向於個性主義的，他在青年時期提出了「任箇人而排衆數」（「文化偏至論」）的主張。在五卅時代，他曾說過：「一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熱風」：隨感錄：三十八。）又說：「必須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熱風」：悵悵而死。）顯然看得出尼采、史蒂納等給予他的影響。（自然，他並非無條件地接受尼采等的影響，他對於尼采的超人說，就始終抱了懷疑態度。參看拙作「再論魯迅的思想遺產」。）如果關聯着清末到五四時代的中國社會狀態與政治情勢來看，人們必須承認，魯

迅的堅持這種個性主義，是在反封建，反「愚民的專制」的戰鬥意義中，找到歷史的解釋的。而他的個性主義却又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為他痛恨資產階級地主的自私自利，傾向於平等互助的精神，同情被壓迫的弱者，憎惡「向弱者抽刃」的驕頭。一到了民族革命與階級鬥爭顯示了民衆力量的偉大，他便開始放棄個性主義的陣地，而轉向於新民主的集體主義。他在二二四年已經說過：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崙過 Mt. 山，說：『我比 Mt. 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着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披山那一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了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以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墳」：未有天才之前。）

在一九二五年，他更明確地承認羣衆在改革運動中的力量，但教示有志於革新的青年，要注意於羣衆的教育與訓練：

「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墳」：雜憶。）

在一九二六年，他更銳利地喊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出來，中國才有進步。」（「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在這裏，他強調了發展民衆力量爭取革命新勝利的主張。

這其實是他過去所提出的啓發人民自覺的主張在羣衆本位思想下的具體發揮，和以人民爲鬥的諸葛亮專政主義是有着本質上的差別的。因爲如果他不承認羣衆有「理性」與「勇氣」，就無從「啓發」。

誠然，在一九二八年以前，他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還有相當距離，但不能忽視從二七運動直到大革命這一段期間，他的思想正在蘊釀着新的變化，這正是他的日後跨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歷史性的準備。不把這一關節，是不能圓滿地說明魯迅的思想轉變的。

假如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之間，是魯迅由個性主義向民主集體主義轉變的時期，那末，一九二八年就是他由民主集體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轉變的關口。從那以後，他便高舉社會主義的大旗，爲被壓迫大衆的生存與解放而勇猛戰鬥。「革命的愛在大衆」，他是用了他的全部生命力實踐這個主張的。資產階級的文人在不斷侮蔑大衆，他反擊了這種侮蔑，說：「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二心集：習慣與改革。」）擁護舊社會秩序的學者把文化看作是由少數人創造的，他諷刺了這種歷史觀，說：「中國的學者

們，多以為各種智識，一定出於聖賢，或者至少學者之口；連火與草藥的發明應用，也和民衆無緣，全由古聖王一手包辦。」（「花邊文學：知了世界。」）他確切的相信人民大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信賴大眾的力量與正確。那些大眾的壓迫者，剝削者，那些屠殺大眾的劊子手及其幫兇，不但在行動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大眾當作蟻蟻一樣踐踏；魯迅憤怒地嘲笑了這些「蚩蚩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英雄：

「他們以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員道，『減少一些也是致太平之道。況且那些不過是愚民，那喜怒哀樂，也決沒有智者所推想的那麼精微的。知人論事，第一要憑主觀，例如莎士比亞……』」

「放他媽的屁！」禹心裏想，但嘴上却大聲的說道：「我經過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灑』確是錯誤了。以後應該用『導』！……」（「故事新編：理水」）

在這裏，活畫出了那些蔑視大眾糟蹋大眾的正人君子的嘴臉，同時也描出了一切尊重大眾愛護大眾的嚴肅工作者的胸襟。——禹作了這種精神的象徵。爲了刻畫這種精神，魯迅描寫了禹堅決打破舊的成法，尊重民衆意見改「灑」爲「導」的無畏氣概：

「我看大人還不如『幹父之蠶』，」一位胖大官員看得禹不作聲，以爲他就要折服了，便帶些輕浮的大聲說，不過臉上還流出着一層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聲。大人大約必知

這人們在怎樣談說老大人罷……」

「要而言之，「灑」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好法子，「白鬚髮的老官恐怕脖子鬧出痧子來，就搶着說道：『別的種種，所謂「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點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龜，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徵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義，無論如何，非「尋」不可！」（「故事新編：理水。」）

由侮蔑大眾來打擊大眾的革命戰團，這原是一切壓迫者及其「幫忙」與「幫閒」通行的戰術。他們明明也知道大眾力量的可畏，但他們却有一枝阿Q主義的曲筆，把明是非、辨黑白的大眾譴責成爲「盲目的暴力」。『沒有理性，沒有明確利害觀念』，『雞來迎雞，狗來迎狗』，這就是「第三種人」杜衡評述莎士比亞名劇「凱撒傳」時對於「群眾」所下的論斷（聰明的讀者不會以「理水」中提到莎士比亞的名字而感到奇突吧），而這一論斷確也代表一般畏懼工農革命者的普遍心理。魯迅用憤火照出了他們的肺癆，同時也擊中了他們隱隱作痛的傷疤：

「真的，「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爲了現在。這一比，我就疑心羅馬恐怕也曾有過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感情並不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所操縱的群眾，但是被驅散，被壓制，被殺戮了。莎士比亞似乎沒有調查，或者沒有想到，但也許是故意抹煞的，他是古時候

的人，有這一手並不算什麼玩把戲。」（「花邊文學」；又是莎士比亞。」）
 在另一處，他提出了與侮蔑大眾者尖銳對立的見解：

「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適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棒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翼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渴……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騙誰，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
 （「且介亭雜文二編」：「題未定」草」。）

歷來的反動統治者用了一切暴力和陰謀將民衆壓迫成了病態，還要無恥地把國勢貽危，內憂外患歸責於老百姓，每逢外侮逼至，中國小百姓就得到了「一盤散沙」的惡諺。魯迅依據明確的階級觀點，指出了誰是「一盤散沙」狀態的真正負責者，他說：

「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饑餓，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南腔北調集」：沙。」）

在魯迅還沒有成爲一個階級論者以前，他對於大眾——尤其是農民——的痛苦，是深深地覺

察到了的，他「知道他們學生受着壓迫」（「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後來他「看了許多外國小說……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同書。）然而先前他只能根據人道主義對他們表示同情。一到他接受階級論以後，他便清楚地認識了，惟有依靠被剝削階級的獨立戰鬥，才能解除大眾的痛苦。因此，提高大眾的階級自覺，讓他們「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病中答「救亡情報」記者的談話，轉引自蕭參作「紀念魯迅」），正是增強大眾戰鬥力量的第一步。他指明：「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他指出，剝削階級爲要教被剝削階級忘了自己的痛苦，麻痺大眾的不平的靈魂，常是拿有利於少數吃人者的道德來籠罩天下，以便安穩地享用人肉這寶；因此「勤人貧樂道成了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花邊文學：安貧樂道法。」）他用了醜着憤怒的筆尖諷刺了不把大眾當人的「安貧樂道法」，這類諷刺文除了一再見於他的雜感文外，在他的故事速寫中也可以找到：

「你們坐近一點來！」萬不答他的詢問，只對大家說。「查的怎麼樣？」

大員們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對，列坐在淺籃的下面，看見咬過的松皮餅和暗光的牛骨頭，非常不自在——卻又不敢叫膳夫來收去。

「裏大人」，一位大員終於說。「倒還像個樣子，——印象甚佳。松皮水果，出產不

少；飲料呢，那可豐富得很。老百姓都很老實，他們是過慣了的。裏大人，他們都是以善於吃苦，馳名世界的人們。」（「故事新編：理水。」）

「人肉筵宴」的享用者是要勸大眾「安貧樂道」，而魯迅却是要教大眾「想到自己的力量。」（「南腔北調集：談金聖歎。」）爲了要幫助大眾的戰鬥，他號召：「有志於改革者……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二心集：習慣與改革」），他勸告「做偉大事業的人要把自己當作「大眾中的一個人」（「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他提倡大眾文化（新文字、大眾語、連環圖畫、木刻等），去加強大眾的精神武裝力量。

第六節 表現在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

魯迅靈活地運用了階級論來襲擊舊社會和「黑暗主力」，代表勞苦大眾而吶喊，而戰鬥，使他由民主主義者進步而爲社會主義者，由民族主義者發展而爲國際主義者。但是，在魯迅的思想中，正如在一切中國無產階級戰士的思想中一樣，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正是統一起來，不可分割的。在下面，我們就要研究魯迅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一致。

魯迅晚年的接受國際主義，從他個人的思想發展過程看來，和他早年反對國粹主義的戰鬥是有着直接的聯繫的，正如他的接受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際主義），和他過

去反對中應主義的戰鬪傳統，有着直接的聯繫一樣。他唯恐「中國人自世界擠出」，所以和一切崇拜國粹的頑固派苦鬥。他後來不但沒有如別人一樣從反國故的戰線退却，並且以愈戰愈勦的精神繼續打擊一切閉倒車的復古份子。在戰鬪過程中，他看出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和腐敗，看出了世界工人階級的生長與銳進，終於作了國際資產階級的死敵和世界勞苦大眾的戰友。

如果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夜所憧憬的，是「自覺至，個性張」的「人國」，在五卅時代所憧憬的，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民族國家，在大革命時代所憧憬的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那末，在大革命失敗後，他所嚮往的，就是「沒有人壓迫人的無階級社會」。這個「理想之光」照耀他站在國際主義大旗下爲無產階級戰鬪到死的巨大工作，燃燒他的反剝削制度的新人道主義精神。他不是一個空談理論的書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戰鬪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幫助他處處從實際上去磨銳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鋒刃。因此，他熱烈地同情和保衛「一個嶄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的蘇聯；他咒咀那些誣蔑和毀謗蘇聯的帝國主義者，揭穿了他們欺騙大眾的鬼蜮伎倆：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靈道，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

，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諺語，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牠才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利害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退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麼甜膩的話語，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同上。）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在魯迅晚年的思想中，是表現得再明確沒有。在早年，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宰割中國民族，他是深深地感覺到的，並且用了猛烈的火力去攻擊殘暴惡毒的民族敵人，但那時僅僅是把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結合起來。祇在他接受了階級論以後，他纔自覺地把握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斯大林說：「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繫起來，並且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勝利的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聯盟。」（《論民族問題》中譯本。）這個公式在魯迅的思想表現中，是顯動地被運用着。在許多地方，他總是堅定而具體地昭示出：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處於絕對敵對的地位，但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站在同一戰線上。他的辨明友敵分別憎愛的現實主義精神，在確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中，達到了最高的表

現。在東洋帝國主義的血爪開始攫奪東北土地的第三天，他回答了文藝新聞社的一個時局問題：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二心集：答文藝新聞社問。』）

在這百餘字的答案中，分明指示了中國人民和蘇聯與世界勞苦大衆在利害上的聯帶一致，揭露了東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實意義，說明了這個侵略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威脅，也暗示了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結成的可能。

正因為魯迅站在民族的與無產階級的立場，堅定地把握住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有機關聯性，所以他對於帝國主義的鬭爭，是用了最高度的警覺性與明確性質徹著的。他不斷指出了民族殖民地化的危機，證明不能爭取民族的徹底解放，一切民族復興、工商救國的空論都不過是夢囈。那原因是「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訶德。』）他在大聲警告，帝國主義是時刻在懷着殺機，用槍尖瞄準着中國人民，「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微俸的，只是還沒有被打着。」（『准風月談：「抄靶子」。』）他更揭穿了帝國主義在不斷用「公理」、「正義」、「人道」之類的鬼話欺騙被壓迫民族，因此提醒國人對於帝國主義陰謀的警覺與戒備：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牠要去懲辦了。牠一面去懲辦，一面來欺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牠們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裏？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是的，中國人民「第一需要記性。」（「墳：娜拉走後怎樣。」）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時期，魯迅的教訓是值得一切中國人記取的。

帝國主義要征服殖民地，必須要蒙養當地土產的鷹犬，這些鷹犬不管在打着怎樣好看的旗幟……「民族主義」也好，「國粹主義」也好，但他們總不外是「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魯迅是懷着極大的恨意來攻擊這些鷹犬的：

「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着「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却是對着「幹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

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爲首領的，是蒙古人披都（Batu），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披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在這裏，他不僅揭破了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抑且展示了他的民族主義要求和國際主義精神的交流。他所要愛護的，是「無產階級的模範」，「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所爭求的，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根據這個觀點，他把對於帝國主義的熱烈的憎，和對於社會主義的熱烈的愛，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傾瀉出來：

「……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是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二心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根據同一觀點，他擲出了強烈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投槍。他公開宣布自己是「憎惡法西斯蒂的一個。」（「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在他的雜文中，他不止一次對法西斯蒂屠殺

民衆，壓迫革命，消滅自由和摧殘文化的暴行作了銳利的抗議與諷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早就看到了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正在向法西斯化的道路奔馳：

「據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正是龐大權力的政府的出現，這是十九世紀人全所夢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說了；就是英國的國民政府，「牠的實權也完全屬於保守黨一黨。」美國新總統所取得的措置經濟復興的權力，「比戰爭和戒嚴時期還要大得多。」大家做動物，使上司不必徵求什麼同意，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歎盛哉，這樣的好榜樣，那能不學？」（「准風月談：同意和解釋。」）

魯迅的反對法西斯主義，不單是作爲一個民主主義者出陣，同時也是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迎戰。他曾參加過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組織，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召開的反世界大戰反法西斯蒂大會，他便是組織者之一。他曾率領上海文化團體代表親赴上海德國領事館對納粹摧殘文化的暴行提抗議書；他也曾熱烈表同情於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反法西斯戰爭（以上三點參考蕭參作「紀念魯迅先生」）。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他也把握到了中國民主革命與國際主義運動的聯繫。正因爲他堅強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世界勞苦大眾利益，所以極端憎惡國際法西斯蒂惡魔；也正因爲他熱烈支持中國工農大眾解放戰鬥，反抗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反動勢力，所以猛烈攻擊國內的法西斯主義毒蠱。他不只一次嘲笑了和打擊了那些偷運和抄襲外國法西斯主義的「黃臉乾兒們」（「准風

月談：華德焚書異同論」），他曾特別強調反法西斯傾向的爭民主運動，喊着「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二心集：答中學生雜誌社問。」）在他和他的戰友的號召之下，保衛民主反抗法西斯主義的伏流是在各地文化界奔馳着。

和他的攻擊乾兒式的法西斯主義一同，他反對阿Q式的民族主義。阿Q式的民族主義者一聽到了「黃禍」兩個字，便「得意了好幾年，準備着去做歐洲的主子。」（「淮風月談：黃禍。」）他們一向在誇耀着：「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他們「硬霸「元人」爲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正像阿Q以做趙太爺的「本家」爲光榮一樣。（「三閒集：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他們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去「西征鞑羅斯」，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在幫忙恩主轉移大眾反對帝國主義的目光。是要大眾追隨在大亞細亞勇士的之後，去進攻中國真正的友邦。魯迅用雷火照出了他們散佈的「美豔的毒菌」。在他的歷史解剖刀之下，暴露了阿Q式的民族主義者的淺薄無聊與昏庸無恥：所謂「黃禍」，其實是德皇威廉所想像的佛陀侵入歐洲文化，與華夏無關；所謂「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的時代（「隨便翻翻」），而所謂「西征鞑羅斯」，「倒是俄人做奴的資格比我們老。」（同上。）

魯迅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跟一切民族失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阿Q式的民族主義勢不並立的，因為它和國際主義是血肉相連的。從國際的意義來說，它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其最後目的是實現「無階級的社會」。但是，中國還處在帝國主義暴虐壓迫之下，不首先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爭得民族的徹底解放，中國人民就不能擺脫奴隸的枷鎖，走向更高階段的革命。魯迅在作爲國際主義者參加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時，沒有叫他的愛國熱心打半點折扣。他確鑿地宣稱：「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自從「亞細亞勇士」的屠刀從東北一路殺進來以後，他向全中國警告民族危機迫使全國人民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分界線，他憤激地攻擊亡國主義者，號召民族的團結：

「……當「揚起火鞭」焚燒「韓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爲未受傅彥長先生的薰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非洲的阿剌伯人了嗎？」（「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正當全國人民在「亞細亞的勇士」的刀光劍影中掙扎於死亡線上的時候，「先安內然後攘外」的沉濁空氣在窒塞民族的呼吸，一方面是「誘敵深入」，「縮短防線」的對外「戰略」，另

一方面是「雖流血亦所不辭」的對內政策。（「偽自由書：戰略關係。」）魯迅的反民族失敗主義的鬭爭，在這時就具體化而為反不抵抗主義，反安內第一主義的鬭爭。他說：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怕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南腔北調集：論

「趕種」和「逃種」。1）

事實很快證明了他的豫見。「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聽命國聯爺爺的孝……誘敵深入的和平」（「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訶德」）給予「亞細亞勇士」「深入」以無比的便利。從此以後，「親善」、「提攜」的老調子又瀰漫於東亞，尊迅是愛懼這「親善」、「提攜」發展下去的悲慘後果的：「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據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太陽的圓圈的罷。」（「且介亭雜文末編：我要騙人。」）他不及看見中國神聖的民族革命起來，就逝世了，這不只是他個人的遺憾。然而，他的遠慮並非過慮。他深知民族失敗主義的老豹擬潛伏在某一章「君子」的內心太深，一到民族遭到挫敗，「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蠍子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喫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南腔北調集：沙」）。在這樣的「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語出「抱

朴子」，魯迅在這裏把這兩句話加以新的解釋的兩極化中，用「排日即國賊」的罪名加在「蟲沙」似的「小民」頭上，自然是「名正言順」的。而不幸，魯迅在民族革命戰爭前夜所說的這些話，已經成爲部分的被證實的豫言了。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幸，鴉鵂的「上樹」和「騰空」，豈但對中國沒有絲毫損失，而且越發澄清了中國的民族陣線；沒有鴉鵂，就不能反覆蟲沙的團結力偉大。小民雖如「蟲沙」，但決非「散沙」，「沙」，因爲「小民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沙」）正是根據了這個確信，魯迅擁護了並號召了民族統一戰線。

「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是因爲我不但是二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認爲非常正確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他在很早就暗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爲必要條件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不過先前的聯合戰線「目的都在工農大業」（同上），而現時的統一戰線目的却在民族生存，「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以一切生活都與這問題有關……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的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且介亭雜文附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因此，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答徐懋庸並關於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

的。」「(同上。)這樣，他就堅持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政策，反對一切破壞統一戰線的企圖。

然而，魯迅的民族主義和他的階級論完全是一元的(參見馮雪峯作「一種誤會」)，他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非常明確地貫串在他的思想與藝術中，因此斷然反對了那些藉口「民族立場」而進攻國際與國內的勞苦大眾的反動傢伙。他在攻擊「民族文學」時，曾經這樣表白了自己的階級立場：

「作爲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取得同一的行爲，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鬪爭。」(「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他的堅定的階級立場，就在強調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也沒有絲毫動搖過，他不曾叫民族團結的熱潮沖昏了自己的頭腦。他大聲警告一切擁護抗戰的人們：「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且介亭雜文附集：半夏小集。」)他深刻指出：民族統一戰線「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鬪爭，而是將這鬪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鬪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鬪爭，將一切鬪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鬪爭這總流裏去，決非文學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

到和到大，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且介亭雜文附錄：論現在我們的文壇運動。」）正因為他堅持着民族立場與階級立場一致的主張，所以他猛烈反對藉口「國難期間，共體時艱」，對勞苦大眾實行「有理的壓迫」（「偽自由書：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警告愛國民眾時刻提防有可能化為「猿鶴」的「君子」把自己出賣，暗示被壓迫民眾要分辨清楚，迫害他們的，究竟還是長毛之類的「流氓」，還是「短毛」、「花綠頭」之類的王軍。（見「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第三節。）而在另一方面，斥責了那些「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道德」替「亞細亞勇士」清道的「高超的理論家」。（見「且介亭雜文附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而且，在堅持抗日民族革命戰綫的時候，魯迅也並未忘記他的國際主義立場。他明確宣示，中國人民的反對軍閥帝國主義，並非仇視一切日本人，「日本和中國的人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且介亭雜文：『活中國的姿態』序。」）但自然，在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沒有爭得自由解放之前，和壓迫民族決談不到「親善」與「提攜」，因為「現在還不是這樣的時候。」（同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這樣生動地互相滲透在他的每一個政治思想細胞中。

如前所說，魯迅的傾向國際主義和他過去反國粹主義的開爭有直接的聯繫。在這裏，我們要研究，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統一性是如何表現在他的文化思想中。

魯迅是最早堅決主張吸收外國文化來救治中國民族的精神敗血病的。在他開始輸入歐洲文化的時候，他已經具有民族主義的熱烈傾向。他最初介紹西洋文學，即以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為主，這因為中國民族的命運，和那些被壓迫民族相似，中國民族要爭得自由，不得不引別的謀自由的弱小民族為同調。在論及介紹波蘭文學時，魯迅就曾自白過：「『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誠然，在當時，他的民族主義鋒芒，主要還是對準滿清壓迫者，但他已經看到了，中國民族應當覺求別國的新聲來鼓起戰鬥的熱情，反抗民族的壓迫。他在『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說：「……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瞭然有當有心，按邦國時期，稽覽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一就可見他的介紹外國文學，不但單純出發於藝術的要求。到了五四時代，魯迅高舉了反國粹的旗幟，也是主要著眼於民族的生存。「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熱風』）所謂國粹，是否能保存我們呢？魯迅的回答是否定的。此後，他的打擊國粹派的戰鬥，構成了他的民族自我批判重要的一部分，從民族的生存出發，他反對復古，反對倒退，「因為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華蓋集』：十四年的贖經。）

他希望用外來的新文化來洗刷羶封的舊中國，甚至希望「真有良心」的外國人「替我們頌咒中國的現狀。」（「墳：燈下漫筆。」）然而，後來的事實告訴了他，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的民族組織不「硬化」。魯迅慨然警告中國人，「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窩敗下去。現在聽說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我們的舊文化來活埋我們這窩敗民族。」（「集外集：老調子已經唱完。」）顯然，半殖民地的中國，不能被帝國主義所愚弄，爲了救治民族硬化的危機，應當毫不遲疑地吸收外國文化的血液，因爲「中國固有的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南腔北調集：真假堂吉阿德。」）所謂吸收，不是不加擇別胡亂地吞嚥，而是批判地有系統地輸入。在轉變爲階級論者與國際主義者之後，魯迅更堅強地主張中國應當大膽地取用外來的文化，但不能是被動地讓別人「送來」，而必須主動地從外國文化倉庫中「拿來」，這就是說，對於外來文化，「要運用腦筋，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落後的中國，要按照自己的民族解放需要，批判地提取外國文化的精英，一面消除中國「固有文化」的毒質，一面培養中國新文化的根幹，這就是「拿來主義」的本質。在這裏，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一致，非常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魯迅是外來文化的辛動介紹者和有力鼓吹者，同時又是民族文化遺產的優秀繼承者和傑出發

揚者。他對於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的關係，有着最正確的理解。他一面鼓吹大量介紹外國文化，一面贊成採取民族形式，一面主張不怕「歐化」，一面又提倡「地方色彩」。事實上，他的全部作品，是鐸化了世界進步的文化成果，而又保留了特有的民族風格。

如果說，魯迅的國際主義和他的反對民族閉關主義有歷史的聯繫，那末，他的民族主義和他的尊重民族戰鬥傳統有直接的聯繫。他的對於舊中國與腐敗傳統的憎惡和詛咒，並不絲毫減弱他的民族自尊心，反之，他是非常珍重歷來中國民族的傳統戰鬥精神的。他曾說：「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却還有竄身海外，志在恢復的人」（「華蓋集：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顯示了他對於民族先烈的敬意。在他到了廈門以後，看見鄭成功所造的城壕遺迹，不禁慨然說：「一想到除了台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他痛恨滿清政府，除了是因為牠用苛政壓迫漢人外，還因為牠毀滅漢人的民族自尊心，他指出，滿人的任意刪改漢籍，其目的在於「使天下士子閉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會有過復有些有骨氣的人。」（「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在堅持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與自尊心，正是發揚民族革命精神最必要的任務。魯迅正是從各方面執行這個任務的愛國者。當少數軟骨蟲在那裏高呼中國人民失掉了民族自

信力的時候，他提出了有力的反駁：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爲大家所知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醜態。」（「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然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民族軟骨蟲是真的失掉了民族自信力的，他們向王道的宣揚者獻策說道：「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分明是「攻心爲上」的戰略，而魯迅指出這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偽自由書。」）民族軟骨蟲所渴望的，是侵略者用真正的「王道」來代替「霸道」，但他們不知道：在歷史上，「……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乃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如果從奴隸立場看來，在侵略者實行「王道」的時候，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墳：燈下漫筆」），而當「霸道跑

101238919

來」的時候，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同上）。然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不會到來了，於是奴隸悲哀了，因為他們所渴望的「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的「王道」是給「頑民」弄得毫無根據了」。魯迅確鑿指出，中國民族的心是斷然征服不了的，即使「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任憑王道宣揚者如何賣力，可是，他至多是少數中國軟骨蟲見了害怕的火神，在今天，中國人民不是處於元、清之際，他們用不到感謝火神，更不會被王道所愚弄。

但是，魯迅認為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是要用民族戰鬥來培養的，因此，他不僅厭惡活得最舒服最橫暴的漢奸，而且也反對活得最清高的「逸民」。（「半夏小集。」）

中華民國政變年肆月捌日

送存

自



國家圖書館



002385318



4
3
-2

籍